

兩岸發展史研究

第四期

折射的陰影：戰後國民黨的黨政革新運動
(1946-1947)

王良卿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中大出版中心
西元2007年12月

目 錄

《兩岸發展史研究》第四期

臺灣史專號

專 題 論 文

- 林占梅潛園雅集及其文化義涵——
清中葉臺灣文士生活之一例／徐慧鈺…………… 1
- 農業環境與移民事業——
臺東廳下私營移民村的比較／陳鴻圖…………… 35
- 戰後初期臺灣人的認同轉變／陳翠蓮…………… 81
- 宗親組織與基隆中元祭——
以黃姓宗親會為例／吳蕙芳…………… 125

研 究 論 文

- 折射的陰影：
戰後國民黨的黨政革新運動（1946-1947）／王良卿…………… 171
- 從「國中之國」到「省中之省」——
1949-1955年伊寧與北京在新疆民族自治問題上角力的背景、
過程與結果／吳啟訥…………… 217

書 評

- 評介荊子馨著《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陳世榮…………… 277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中大出版中心

2007年12月

折射的陰影：戰後國民黨的黨政革新運動 (1946-1947)*

王良卿**

摘要

抗戰勝利初期的革新運動係由國民黨右翼幹部所發起，實則國民黨人懼於統治失墜的集體內在焦慮，以及黨國體制經受戰後新局的外部刺激之下，聯合釀成的政治產物。他們歷數國民黨執政十餘年來的廢化無能，要求放棄戰後初期對共黨問題一度採行的綏靖政策，並且期待以革新黨務、政治的姿態，喚醒國民黨的執政活力，挽回所謂的黨國尊嚴。革新陣營才擴大取得其他一些黨外幹部的同情及參與，並在中央與地方廣泛建立組織、積極鼓動宣傳，使得這場運動幾乎成為戰後初期政權內部最引人注目的一場政治運動。如果就革新陣營自己公開表明立場來說，才是一場所謂的改革運動。某種程度而言，革新運動折射了國民黨的若干積弊，無論是就革新陣營的興革訴求來觀察，或是導致這場運動沉寂、落幕的結構性因素，甚至就是運動本身。無論如何，這場運動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才首先掀起的最重要的一波自救之舉。透過對這場運動內情的考察，我們才能較好的理解戰後國民黨人如何認知國民黨自身的危機，以及他們肆應時局的能力和局限。本文並特別注意到學界前所忽略的革新運動運作狀況，尤其是在地方上的操作，以及運動的沉寂乃至結束的原因，期能豐厚對於戰後中國政治的認識。

關鍵詞：革新運動、國民黨、蔣介石、宗派主義、CC系

* 本文根據兩位未具名審查委員的意見修改而成，特此敬謝。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 二、清議孳蔓與派系媒合
- 三、革新運動的操作與擴散
- 四、革新運動的落幕
- 五、結論

一、前言

抗戰後期，國民黨內部以蔣介石（1887-1975）為中心的統御秩序逐漸呈現某種脫逸控制的傾向，即使連以往替蔣鋪陳地位的黨內右翼派系，也不免懷有怨懟，嘗試在國民黨黨國體制內尋覓可行的救黨途徑。就此角度而言，發軔於抗戰後期，由 CC 系與「黃埔系——復興社——三民主義青年團」勢力（以下簡稱黃復青勢力）公開攜手，推展於 1946 至 1947 年的「黨政革新運動」（以下簡稱革新運動），實則構成了要求變易黨內秩序的某種抗議精神，例如對於黨內民主的叫喚、不滿於派系均勢的改變、對於總裁權力氾濫的限制等等。另一方面，戰後初期的詭譎政局也是催生國民黨右翼攻勢的重要背景，基本上，這是透過反對政學系要員、反對黨國綏靖路線的清議精神而表現的。由兩支國民黨右翼派系扮演主幹角色的革新陣營，同時也擴大爭取到其他一些黨內幹部的同情及參與，並且在中央與地方廣泛建立組織、積極鼓動革新口號的宣傳，因而使得國民黨人自發的這場革新運動幾乎成為戰後初期政權內部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場政治運動。如果就革新陣營自己公開表明的立場來說，也是一場所謂的改革運動。

某種意義而言，革新運動折射了人們所熟悉的國民黨若干積弊，無論是就革新陣營的興革訴求來觀察，或是導致這場運動沉寂、落幕的結構性因素，甚至是運動本身。無論如何，這場運動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內首先掀起的最重要的一波自救之舉。透過對這場運動內情的考察，我們才能較好的理解戰後國民黨人如何認知國民黨自身的危機，以及他們肆應艱困時局的能

力和局限。學界既往對於革新運動的研究，係以易勞逸（Lloyd E. Eastman, 1929-1993）*Seeds of Destruction* 書內專章為嚆矢。作為先驅性的研究成果，易勞逸為國民黨內部動態和革新運動提供了一幅全景但目前看來可能失之簡略的圖像。以 *Seeds of Destruction* 為基礎，後繼的學術工作者或者強調了三青團在革新運動中的角色，或者注意到幾支擁蔣派系在運動中的對應關係，或者抉發了運動所蘊含的「代際衝突」問題。¹本文則大量利用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案》、革新運動刊物、個人日記、憶述文獻、報紙，旨就革新運動進行全盤性的再考察，特別注意到前人所忽略的革新運動運作狀況（尤其是在地方的操作）以及運動的沉寂乃至結束的原因，期能豐厚對於戰後中國政治的認識。

二、清議孳蔓與派系媒合

（一）均勢的變化

抗戰期間，國家機器的重心侷促西南一隅，政治鬥爭基於資源緊縮而變得更加尖銳，復興社成員桂永清（1900-1954）曾有「大家都想籠罩全國，不肯負局部責任」²之語，所言頗為傳神。及至 1945 年，戰爭的前景似乎預示了頗為樂觀的傾向，國民黨內各派系考慮的事情則是：如何在勝利來臨的當口，巧妙地把自已放在割取政治大餅的有利位置。但是政學系勢力在抗戰後期至戰後初期的政治擴張，破壞了黨內多數派系的盤算，CC 系、黃復青勢力等黨內右翼派系目睹蔣介石對政學系的倚賴與日俱增，尤感失望。³

- 1 學界對於革新運動的研究成果，至少包括下列幾部專著的專章、專節，以及學位論文：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唐維朋，〈戰後中國國民黨派系關係之研究——以黨政革新運動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8 年；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1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年）。
- 2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 年），1939 年 11 月 30 日條，頁 105。
- 3 針對抗戰期間國民黨派系主義的盛行，齊錫生提出結構性的分析觀點，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1930年代上半，政學系曾在楊永泰（1880-1936）等人的經營下，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抗戰時期，政學系仍然穩健發展，1943至1944年間，何廉（1895-1975）、熊式輝（1893-1974）、張嘉璈（1889-1979）等人甚至打算把政學系塑造為一個組織型派系，最終目標則是成為一個投入來日憲政選舉的獨立政黨。該項構想雖未實現，政治企圖則不言可喻。⁴另一方面，太平洋戰事爆發，美國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境內政治的參與者，國家民主化問題躍上檯面，CC與黃復青等政治意識強烈的黨內右翼迭經美方指摘，認係保守、反動。在此背景下，既獲美方欣賞，並且主張以政治途徑解決中共問題的政學系，遂成為蔣介石處理國共談判事宜的重要倚石，連帶的，該派系要員也被畀予對蘇聯交涉的重任。⁵在攸關派系利益的人事焦點上，戰後兩大勝利果實悉由政學系人物掌握，即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此外，政學系依舊維持政府部門裡的優勢代理人地位，甚至跨足中央黨部要職，此為戰前未有之事，例如抗戰期間王世杰（1891-1981）兩度出任中央宣傳部長，吳鐵城（1888-1953）則自1941年開始擔任中央秘書長，直到1948年底。⁶

以宗奉蔣介石的領袖地位為前提所建構的派系均勢，在黨內右翼分子的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p. 206-207.

- 4 政學系分子的組織構想，源自1943年底侈力掀起的憲政運動熱潮，他們寄望透過一個具體的政治組織，俾便參與將來的憲政事業。根據何廉的說法，蔣介石允許了此計畫，何廉等人甚至為擬議中的組織捐獻基金。不過，這個組織始終沒有成立。一些政學系成員對此提出的解釋是，該派系的領導人張群認為搞組織有害無利。Franklin L. Ho, *The Reminiscences of Ho Lien (Franklin L. Ho)* (New York: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67), p. 313；王又庸，〈關於“新政學系”〉，《文史資料選輯》，輯4（1960年5月），頁81。張群認為搞組織有害無利的審慎心態，並見馮若飛，〈我所知道的張群〉，《文史資料選輯》，輯42（1961年2月），頁202；艾毓英，〈政學系與C.C.在湖北的廝鬥〉，《武漢文史資料》，輯19（1985年3月），頁126。
- 5 林能士、王良卿，〈戰後國民黨人爭取黨外民主化的背景考察〉，《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年），頁557；參見磯野富士子整理、吳心伯譯，《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歐文·拉鐵摩菲回憶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11、118-119。
- 6 何廉指出，抗戰勝利前夕，政學系的影響力已經達到令他人妒嫉、不舒服的程度：Franklin L. Ho, *The Reminiscences of Ho Lien (Franklin L. Ho)*, p. 309。王世杰在1939至1942年，1944至1945年間，兩度出任中央宣傳部長，戰後則改任外交部長，留下的黨職係由吳國楨接充。

眼中，刻正失去平衡，這才是有利於滋長清議聲浪的現實背景。⁷基本上，黨內右翼勢力對於政學系的非議，若和訓政初期的黨人批評，以及中國古代清議傳統寓含的反把持、反綏靖的精神成分相較，大體並無二致。⁸在某些學者看來，中國歷代的清議並非只是堅持道德信條的思想現象，它經常是作為強力的政治工具面貌而出現的。特別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自居「清流」的清廷士大夫一面抨擊當時有限度容納西方價值的洋務潮流，一面則非難某些當權官吏所採的涉外綏靖路線，當中，清議作為狹隘自私的鬥爭工具，政治色彩尤為顯著。從這個角度觀察，當抗戰後期王世杰、孫科（1891-1973）等人力倡絕對聯蘇、主張與中共開誠相商之際，這些講求現實妥協原則的知識分子，其實是重蹈了郭嵩燾（1818-1891）、李鴻章（1823-1901）等人在六、七十年前走過的坎坷道路。⁹

（二）派系的自保與擴張

孫中山（1866-1925）逝世之後，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常與「恢復黨內民主」的呼聲相伴隨。抗爭者疾呼黨內民主，實欲削弱當權者（多指蔣介石）的統治合法性與道德基礎，因此，「黨內民主」作為一種政治思維，和一種

-
- 7 林能士、王良卿，〈戰後國民黨人爭取黨內民主化的背景考察〉，《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558。唐縱日記，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5 年 9 月 21 日條，頁 542：「近有一傳單攻擊政學系，並列數政學系之名。因邇來政學系尤為顯要，分居要津，使另一部分人失勢。政治上全是一個人事分布問題，無論哪一黨派得勢，便有另一派的反對攻擊，為之領袖者，應兼蓄並用，但應有一政策方針統馭之。」
- 8 柯文（Paul A. Cohen）對中國古代的清議現象提出綜合性的描述，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40-41.
- 9 清議作為一種政治現象，參見易勞逸以十九世紀 80 年代中法戰爭為中心的論述。Lloyd E. Eastman, *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戰時王世杰、孫科對於中共、蘇聯的現實妥協原則，以及黨人的非難，參見王世杰，《王世杰日記》，冊 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1943 年 8 月 21 日、9 月 9 日條，頁 132-133、145-147；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4 年 4 月 30 日、1945 年 2 月 9 日條，頁 427、491；孫科，〈世界潮流和我們的作風〉，1944 年 9 月 18 日在中山學社第四屆年會講詞，《三民主義新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 年），頁 61-62。

訴求口號，其實具有濃厚的工具化、權術化的傾向。¹⁰值得注意的是，此後黨內民主的相關訴求，並沒有因為蔣的黨內地位定於一尊，以及抗戰期間國民黨中央採行若干改善措施（例如下級黨部選舉、帶有限制條件的中央常務委員選舉）而告銷聲匿跡。¹¹抗戰後期至國共內戰階段，約即 1940 年代，國民黨人的黨內民主聲浪再起，且以抗戰勝利後之氣勢為最。和訓政初期黨內異議者的口沫、武力爭執的往事相較，以往捍衛蔣介石的部分子弟兵這時反而搖身變為某種程度的黨內民主宣傳旗手（甚至是抗爭者），這是一個重要差異處。¹²

1940 年代的黨內民主呼聲，很容易被人們視為國民黨人面對憲政時期的預先肆應之道，例如中央組織部於 1941 年恢復、推行下級黨部選舉，曾有「值茲訓政憲政遞嬗時期，本黨負有訓練民眾行使國權之重大使命，若黨部尚不能實行選舉，將無以樹立全民楷模」¹³之語。但是「肆應憲政」的說法，充其量只能揭示黨人籲求黨內民主的外在背景，捨此之外，某些蘊藏在現實底層的內在線索似乎更值得人們注意：首要者，當為派系自保、自擴利益的心態使然。例如恢復下級黨部選舉一事，本即朱家驊就任中央組織部長之後亟欲排上日程的要務，一般認為，這和抗戰期間朱家驊（1893-1963）與陳果夫（1892-1951）、陳立夫（1900-2001）兄弟關係漸疏，打算自樹地方黨務勢力有關。不過，下級黨部選舉的總體進度仍然遲緩，CC 系復多掣肘，終致

10 林能士、王良卿，〈戰後國民黨人爭取黨內民主化的背景考察〉，《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547-551。

11 國民黨在抗戰期間採行若干改善黨內民主的措施，例如 1942 年開始，中常委係以記名選舉產生之，不過，候選人名單由蔣介石預先提出；1941 年，國民黨中央開始指導下級黨部召集省縣代表大會，實施選舉，然而進度頗為遲緩。榮孟源主編、孫彩霞編輯，《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 年），頁 606、804-805；第 171 次會議，1941 年 3 月 17 日，中共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上冊（臺北：編者刊印，未載彙印年份），頁 693；第 175 次會議，1941 年 5 月 12 日，中共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下冊（臺北：編者刊印，未載彙印年份），頁 715-719；李雲漢主編、林養志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3 年），頁 14-15。

12 林能士、王良卿，〈戰後國民黨人爭取黨內民主化的背景考察〉，《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550-551。

13 第 175 次會議，1941 年 3 月 17 日，中共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上冊，頁 693。

釀成 1944 年朱家驊去職的重要背景。最後，陳果夫以過渡的姿態接掌組織部約達半年，陳立夫則在這年冬天重行接手該職。¹⁴

就政治人物的權術動機而言，抗戰後期朱家驊推行下級黨部選舉以資抗衡 CC，實即黨內民主作為政治工具的又一表現。1940 年代，CC 系、黃復青勢力等黨內右翼呼求黨內民主，同樣含有相仿的政治工具化動機：一方面既是派系自保的心態，即盼望建立公平的（暗指符合黨務實力原則的）黨內競爭機制，俾便壓抑那些憑藉領袖姻親關係而起的政治豪門（諸如孔祥熙〔1880-1967〕等財經官員），以及所謂夤緣倖進的官僚型人物（尤指政學系）；一方面則是派系自擴的考量，即居間同步尋求擴張己方勢力的可能性。至於為何必須，以及如何建立公平的黨內競爭環境，俾便實現黨內右翼自保與自擴利益的願望？此即此刻國民黨人呼求黨內民主的第二個重要的內在線索：基於抗拒總裁「人身統攝」的幽微心理，企圖分削、分攬蔣介石的重權。

（三）抗拒蔣介石的人身統攝作風

1936 年 10 月底到 12 月初，行政院政務處長何廉應蔣介石邀請，在洛陽與蔣及其文職侍從共事，這段期間常有機會觀察蔣的生活方式和處理事務的方法。最後，何廉意識到，蔣介石懂得人，但是不了解制度和使用的制度，每當何廉向蔣談到許多事應該制度化的時候，蔣的注意力就會岔開（turn his attention away）。何廉在憶述文獻當中如此評價他的上司：蔣介石擁有傳統的儒家心性。意思是蔣介石辦事首先仰仗「人」、「個人接觸」以及「關係」，不是「制度」。¹⁵蔣介石留給何廉這種觀感的原因極為複雜，學者黃仁宇（1918-2000）則是指陳，蔣之沒有系統，肇因於環境代他抉擇，因此，蔣只得個人力量試行合攏上下，無從運用黃仁宇所稱當時並不存在的「法制性聯繫」因素。¹⁶

14 1939 年，朱家驊接任中共組織部長。他和 CC 系的親善、交惡過程，以及 1944 年朱家驊離開中共組織部長的職位：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 217-219，及相關段落的註釋書目，頁 252-254；王子壯，《王子壯日記》，冊 9（臺北：中共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1944 年 5 月 12、21、27 日條，頁 191、204、210。

15 Franklin L. Ho, *The Reminiscences of Ho Lien (Franklin L. Ho)*, p. 164.

16 黃仁宇，〈蔣介石的歷史地位〉，《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 年），頁 225-272；黃仁宇，〈地北天南敘古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

黃仁宇針對蔣介石的領導作風與歷史地位，提出鉅觀且富同情的解釋架構，不過這名秉持所謂「大歷史」(macro-history)觀點的學者終究沒有否認蔣介石習慣以人身遂行統攝的作為。值得注意的是，基於抗戰軍興以來的實際需要，不論在形式或者事務上，蔣介石的制式權力確是日見集中，隆乎戰前；然而在蔣介石行使人身統攝的實質效度上，根據供職侍從室的唐縱(1905-1981)與一些政治人物的近身觀察，反倒是似乎呈現了日漸降低的傾向：部下陽奉陰違的風氣頗盛，蔣則是動輒顧慮、觀望之餘，尚需敷衍各地各方盤根錯節的制約性勢力。按照這個角度說，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 1883-1946)、徐永昌(1887-1959)，以及蔣的私人顧問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等人即認為，蔣介石根本稱不上是人們所詬責的「獨裁者」；另一方面，由於形式權力與實質效度的相互抵銷，多所瞻顧的蔣介石當然也得不到加強自己地位，以便應付事機、振拔政權頹象的機會。¹⁷

其次，就資源緊縮下的派系競爭而言，蔣介石的任何介入、指揮與仲裁，勢必都難以周全的滿足眾望，結果只會導致他的超然地位愈加傾斜，而不可能如其所願的更加鞏固。最後，國民黨人對於蔣介石的人身統攝性格，諸如事必躬親、手令文化、越級指揮、兼職習慣、道德說教，以及用人作風與知人能力等等，往往不敢苟同。在抗戰期間國民黨政權蔓延集體焦慮的非常時刻，敢言者對此或能懇切諫諍，多數幹部則是陰表怨望，甚至頗為犬儒的流露譏刺心態。國民黨人暗中奚落蔣介石的領導風格，已然成為黨內的不宣之秘，「總裁獨裁，中正不正」的順口溜則自抗戰後期開始流傳。這樣一來，「不滿意總裁」的內部心理日益鮮明，自然也就侵蝕了蔣介石的道德形

限公司，1991年），頁285-293；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頁339-342。

17 唐縱的觀察：「委座之權力在形式上事務上日見集中，而在實質上（如對下員顧慮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見降低……。」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4年5月7日條，頁429。蔣介石在行使權力的實質放度方面，經常難能匹配作為個人集權的形式高度：部下或是陽奉陰違，蔣則是顧慮、觀望，復需敷衍各方：Joseph W. Stilwell,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Inc., 1948), Aug. 4, 1942, Oct. 5, 1942, and Mar. 4, 1943, pp. 133, 157, 197；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冊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945年1月21日條，頁11；磯野富士子整理、吳心伯譯，《蔣介石的美國顧問》，頁136。

象，以及蔣引為黨國內在秩序的紀律基礎。¹⁸

1944年冬天，張治中（1890-1969）上書促請蔣介石注意國人已有思變之心，事實上，蔣介石翼下派系的思變之心同樣昭著。張治中諫蔣過了半月，曾在自宅約集若干黃復青高層分子聚談，根據唐縱記載，席間賀衷寒（〔1900-1972〕，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甚至拿昔日之廣東、總理，臧否當下之重慶、總裁：「張部長約君山〔賀衷寒〕、兆民〔康澤〕、介民〔鄭介民〕、俊夫〔滕傑〕等在其公館談話君山分析當年廣東反動奮奮甚濃，而革命青年均往廣東投放總理，今日全國青年對重慶無不痛憤〔，〕何也？蓋因當年反動力量，總理無法肅清，為國人所同情，並且總理給全國青年以無窮之希望。今日現狀與總裁適相反……」¹⁹唐縱此處摘錄賀衷寒的語意雖然未盡清晰，但是堪可徵見賀衷寒語調之憤激，以及黨內集體焦慮和物議紛紛的梗概。凡此種種現象，顯然已經不是蔣介石平素訓示黨人發揚自信、互信、共信的道德語言所能有效羈勒了。

（四）CC 與黃復青勢力的觸探

從南京十年迄至抗戰勝利初期，國民黨政權右翼的集體意識刻正經歷「無條件擁蔣」而至「有限度削蔣」的變化過程。基於戰時派系自保、自擴利益，以及抗拒總裁人身統攝的幽微心理，激進的國民黨人開始動念分削、分攬總裁重權，清議色彩甚濃的右翼勢力態度尤是。就理論層面分析，包括黨內民主呼聲在內的清議內容發展到最後，位居權力金字塔頂端的蔣介石，勢必成為改革呼求者遲早所要面對的目標；另就現實層面而言，CC 與黃復青等右翼勢力特別認為：如果早在改革伊始，藉由黨內民主的推行，適度限制總裁蔣介石的領導權力，那些「敗壞黨國」的官員就有可能更早失去他們所仰仗的權力最高來源——至少，不易憑恃。²⁰

18 參見林能士、王良卿，〈戰後國民黨人爭取黨內民主化的背景考察〉，《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562-563。「總裁獨裁，中正不正」的順口溜：張立，〈中統頭子徐恩曾〉，柴夫主編，《中統頭子徐恩曾》（臺北：新銳出版社，1994年），頁 43-44；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上冊（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82年），頁 353。

19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4年11月24日條，頁 474。

20 參見林能士、王良卿，〈戰後國民黨人爭取黨內民主化的背景考察〉，《一九四九年：中

國民黨內右翼勢力間的政治媒合過程，正是透過上述背景而展開的。其中，CC系試圖向外聯絡，特別主動接觸了黃復青勢力，時值1942年冬天。剛開始，CC系的合作意願，是透過一些橫跨軍校與二陳背景的中級幹部傳達給黃復青勢力的。不過，幾個戰前曾經擔任復興社書記（長）的黃復青領導分子：康澤、賀衷寒、鄭介民等人，得悉CC的動作後，反應不佳。戰時執掌三青团組織重權的康澤，任內積極聯絡黨內各派，期以扼抑CC地方實力為先，這時候，康澤則是根據一個組織工作者的敏銳嗅覺，臆測CC願與黃埔系棄嫌修好的動機，在於蓄勢合力推倒朱家驊的中央組織部長職位。剛剛就任行政院社會部勞動局局長的賀衷寒（社會部係由CC主幹谷正綱〔1902-1993〕、洪蘭友〔1900-1958〕等人控制，勞動局則於本年夏天增設），則是帶著新近涉足CC系地盤而似乎意欲自清的口吻，痛責居間傳話的人拋棄了黃埔立場。鄭介民承續了賀衷寒的不悅情緒，進一步主張派系同僚應該打擊那些「失節」的黃埔同學。²¹

賀衷寒與鄭介民眼中的「失節」者，至少包括一位黃埔四期學生，刻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擔任組長，並肩負傳話任務的楊錦昱。侍三處座落於重慶市郊南溫泉，地理位置迥異於侍一、侍二處之位處市區；該處經管人事調查、登記、考核諸項業務，若干幕僚具有侍從室其餘兩處少見的CC色彩，主任為陳果夫。²²為了促成CC的派系合作願望，楊錦昱等負有牽線使命的傳話人，嘗試先尋求黃復青勢力次級領導階層的共識與奧援。11月7日，楊錦昱和另一位黃埔出身、具有中央黨部資歷的侍三處同僚左曙萍（1908-1984），共同邀約湯如炎（1901-1973）等四名黃復青成員以及周厚鈞等三名CC系分子，商談兩方合作問題。當晚，九個人在侍三處處內展開初

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560-561。

21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2年11月6日條，頁317-318。復興社歷任書記（長），以及戰時康澤積極聯絡各派：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71、123-125、128-129、216-228。

22 有關陳果夫與侍三處，參見《花叢結緣三十年》（臺北：花叢居仁集資出版，1969年）；徐詠平編著，《陳果夫傳》（臺北：正中書局，1978年），頁627-645；李海生、張敏，《民國兩兄弟：陳果夫與陳立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334-338；王學慶，《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頁221-227；范小方，《二陳和CC》（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19-224；方可編著，《蔣介石和他的幕僚》（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58-163。

步的意見交換，席間談到了如何邀集兩派高級幹部見面，甚至論及兩派第二級、第三級幹部的畫分標準，似乎有意供作將來派系對口的準繩，然而與會的唐縱私忖此舉可笑，不禁暗慨：「余知其無可為也！」²³

12月22日，兩名CC系高層分子：交通部長內定人選曾養甫（1898-1969）、交通部政務次長（兼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徐恩曾（1898-1985），連袂邀宴賀衷寒、康澤、劉詠堯（1909-1998）、唐縱四人，表示盼能經常見面。語間，曾養甫且有頌揚陳果夫淡泊之語。²⁴六人在各自派系的地位，遠遠高於稍前參與侍三處夜談的大多數人士。就此而言，侍三處夜談打算推動兩派高級幹部會面一事，似乎出現了初步成果。不過，曾養甫、徐恩曾二人的邀約之舉，究竟是出於CC公意、二陳授權，或是另有私人動機，實則尚未可知；另一懸疑之處則是作為當事人之唐縱，雖然在日記留下黨內兩支右翼勢力在一、兩個月內數次接觸的報導，但是其後一年半日記卻再也沒有任何關於兩個派系針對合作事宜進行接觸的隻字片語了——直到1944年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以下簡稱五屆十二中全會）開會前夕。

（五）從五屆十二中全會到六全大會

當然，人們不宜輕率的據此反證兩派幹部在這段期間放棄了繼續尋求政治媒合的管道，但是其間，CC系未能實現與黃復青勢力建立合作局面的初衷，或是建立某些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合作範例，倒是不爭的事實。卒至國民黨內目睹政權頹象的集體焦慮逐漸加深，黨人清議言論寢乎其上的，右翼怨望尤其深重。1944年4月間，經常在重慶蘆月旦時政的CC系幹部，就打算透過即將召開的五屆十二中全會，公開推展革新自救的主張。蕭錚（1905-2002）繕具函呈，強烈建請蔣介石黜免「思想落伍」、「怕聞土地改革」的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以及對於戰時經濟

23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2年11月7日條，頁318。當晚應邀者，黃復青勢力：湯如炎、余拯、唐縱、陶銳，CC系分子：唐厚鈞、余凌雲、濮孟九。

24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2年12月22日條，頁327。

「既無認識，又乏決心」的翁文灝（〔1889-1971〕，經濟部長，兼掌資源委員會）的職務，不過陳果夫以「意思極是但罵人太兇」為由，建議蕭錚酌予修改。為了擴大黨內輿情與爭取奧援，衡廬分子先是經由劉維熾（〔1892-1955〕，曾任中央黨部海外部長，廣東籍）的中介，取得幾名和孫科、胡漢民（1879-1936）方面具有密切淵源的黨內幹部的支持，包括人稱「三民主義專家」的中央宣傳部長梁寒操（1899-1975），與馬超俊（1886-1977）、黃季陸（1899-1985）。²⁵接著，CC系分子再一次接觸黃復青高級領導成員，試圖完成一年半之前的聯盟心願。

5月19日，即十二中全會開幕前一天晚上，徐恩曾、潘公展（1895-1975）、葉秀峰（1900-1990）等CC系菁英，聯名宴請黃復青高級幹部：康澤、賀衷寒、鄭介民、蕭贊育（1905-1993）、唐縱、張鎮（1899-1950），CC方面的作陪者則是張道藩（1897-1968）、余井塘（1896-1985）、蕭錚、程天放（1899-1967）。餐會主人徐恩曾起頭徵詢黃復青成員對於時局看法，雙方話題於是導入政治層面。隨著中央全會會期逼近，黨內的政治不滿，愈見躁動態勢，19日派系夜宴參加者同樣力抨黨政現狀，希望十二中全會能夠有所作為，會談氣氛因而炒熱。年來不再獲得蔣介石充分信任的三青团中央組織處長康澤，語氣尤表憤激，席間不僅痛批組織無法施展，也贊成黨政全盤革新，甚至指出蔣介石的領導方式應該有所改革，這使得素與康澤積不相能的CC系分子（特別是在場的蕭錚）興起了「士隔三日，刮目相看」的感受，譽其意見「鞭辟入裡」。在與會者口徑一致的批評聲浪當中，餐會主人之一的潘公展趁勢提議兩個陣營必須合作，政治語調常保高昂的張道藩則是以更激烈的發言，增強了潘的訴求。²⁶

即使只以議題式結盟的觀點看待CC系與黃復青勢力的最新關係，兩派

25 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1980年），頁253。

26 詳見唐縱日記與蕭錚回憶錄：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4年5月19日條，頁431；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頁253。1943年6月，蔣介石任命蔣經國為三青团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連任胡軌（親蔣經國的復興社分子）於4月受任中共組織處副處長一事，康澤已感權散之憂。1944年5月1日，中共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正式開課，校務實際日蔣經國主持。1945年8月，康澤卸任組織處長；10月，出國考察。詳見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284-285、319-320。

的糾合過程仍然欠缺可信的穩固基礎。一個諷刺的例子是，十二中全會召開期間，CC 除外的黨內各派領導人曾經連日集會，相約本次中央全會選舉中常委之時，不選陳立夫；值得注意的是，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且具黃埔系教官資歷）參與了這次跨派系的反陳之舉。²⁷總的看來，CC 系的串聯努力，在十二中全會收割的成果恐怕是見仁見智的。中全會開幕翌日下午，蔣介石約見方覺慧（1886-1958）、賴璉（1901-1983）、蕭錚等 CC 系幹部，聽取黨政革新主張。蔣介石態度雍和，表示樂於接受黨人意見，人事問題則願意授權各人推薦云云，眾人咸表振奮，蕭錚謂蔣「寬宏大量，為余等前此所未見。」²⁸不過，究其實際，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去職一事，似乎才是 CC 系在會議期間僅獲的人事勝利，至於大會通過的多項決議案，實則欠缺令人耳目一新的內容。

包括蕭錚在內的不少國民黨人，將政府高層人事更張之舉視為刷新黨政氣象的前提，從這個角度說，蔣介石是在十二中全會閉幕之後才緩慢回應了黨內的呼聲。黨內各派一致不滿政府人事者，首推掌控國家財政金融已逾十年的孔祥熙，CC 系與黃復青等右翼勢力同作如是觀。²⁹ 6 月，孔祥熙赴美出席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會議，黨內已有孔氏即將讓出政權之說。³⁰此後一年間，孔祥熙陸續交卸他在政府的三個主要職務。1944 年冬天，宋子文（1893-1971）則是代理蔣介石的行政院長一職，翌年真除。³¹同一期間，包括國民黨右翼在內的倡導改革者繼續加緊喚起黨內輿論，然而盱衡國民黨人在權力場域的實際作為，特別是 1945 年 5 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六全大會）當中，黃復青勢力聯合黨內各派就中央委員選舉一事向 CC 系提出挑戰，以及抗戰甫獲勝利，黨內派系競逐接收利益的政治紛亂表現，人們發現：國民黨內派系自保、自擴勢力的心態，仍然勝過那些宣稱

27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冊 4，1944 年 5 月 24 日條，頁 318-319。

28 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頁 254。

29 十二中全會期間，各派系領導人連日集會，眾人不滿陳立夫之外，孔祥熙亦樣成蔣怨府。王世杰，《王世杰日記》，冊 4，1944 年 5 月 24 日條，頁 318-319。

30 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頁 254。

31 1944 至 1945 年，孔祥熙陸續交卸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中央銀行總裁職務。孔祥熙擔任財政部長歷十一年；行政院副院長一職自 1939 年起算，在位五年半；供職中央銀行總裁則達十二年。

挽救黨國，看似廓然大公的政治浮面理想。³²

三、革新運動的操作與擴散

(一) 陪都黨政革新運動座談會

1945年9月1日，距離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過了半個月，蔣介石聞悉政府軍隊已有強賴接收名義遂行劫收物資等不法情事，自謂不勝憂惶。這一天，蔣介石致電陸軍總部派赴南京設立前進站的主任冷欣（1900-1987），指斥所部在京「驕傲放蕩，令人難堪」³³，飭令速行改正等語，略可視為蔣介石對大員劫收的初步反應。然而各地貪競劫收之風迅成不可收束之勢，重慶當局形同鞭長莫及。蔣介石再度懸為厲禁，自稱「中心徬徨，如喪考妣，實無異遭亡國之痛」；言於黨人面前，則是聲嘶力竭，幾至痛哭。後方黨人目睹斯景，唯有歎息自問：「真亡國之表徵歟？」³⁴年終，唐縱則在日記記道：「年初還在戰事的黑暗時期，年末乃是勝利的黑暗時期，政府始終在艱難困苦中。」³⁵

蔣介石身懷亡國之懼，並自個人信仰尋求撫慰之際，³⁶美國特使馬歇爾

32 六全大會幾乎成了黨內各派痛陳黨機器廢化無能、人謀不臧，以及宗派意識貽誤黨國的清談論壇。然而大會讓國民黨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共委員選舉爭端，則是恰好說明了六全大會本身，正是宗派意識貽誤黨國的又一派系爭才場。王良卿，〈派系政治與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第六屆中共執行、監察委員選舉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21（1996年12月），頁 137-150；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 215-229。關於六全大會，並見邵銘煌，〈華抗戰勝利而維縲——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召開與時代意義〉，《近代中國》，期 149（2002年6月），頁 116-134；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頁 317-332。

33 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事略稿本，1945年9月1日條。

34 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事略稿本，1945年10月25日、11月3日條；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冊 8，1945年9月26日、10月24日、11月2日、11日條，頁 168、178、182、185。

35 唐縱，〈本年反省錄〉（1945年），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頁 569。

36 蔣介石這時的亡國之憂不只起於接收弊端，即連他在 12 月中、下旬的南京之行，目睹首都暮氣沉沉，雜亂污穢，不禁才興起亡國之懼。耶誕節當天，蔣介石則是記道：「今晨未醒以前，夢見一人，手持明燈，照我胸腹後，乃與余握手，余即醒。此必基督待恩又進一步之象，五年前乃以膏油沐我首肯也。」詳見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

(George C. Marshall, 1880-1959) 適於 12 月抵華，意在調停國共兩黨因受降問題掀起的戰端，並促成中國的和平統一與民主改革。下旬，蔣經國 (1910-1988) 則以蔣介石私人代表資格訪問在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刻與中國簽訂友好同盟條約的蘇聯，要求史達林 (Joseph Stalin, 1878-1953) 調解國共衝突，這名蘇聯領袖則是鼓勵國共並存，但是頗以美國在華軍事等勢力為慮。³⁷同一期間在重慶，孫科、陳布雷 (1890-1948) 以及若干政學系要員，例如王世杰等人，則是經由蔣介石的政治委託，刻就政治協商會議籌開事宜先行展開內部磋商。磋商以和平為基調，王世杰甚至主張「本黨此次下大決心，作一妥協之嘗試。」不過，未能參與磋商的 CC 系與黃復青勢力意氣甚烈，諸如方覺慧 (CC 系成員) 這類的清議分子只好選擇在黨內談話會等場合，宣洩他們的護黨情緒。³⁸

二戰後，國際政治架構形成以美國、蘇聯兩大強權對峙為特徵的冷戰新秩序，中國境內的國共問題同受牽動，且成為美蘇全球衝突裡的諸多組成部分之一。³⁹隨著戰後政局演變，最讓國民黨內右翼無法坐視的是，蔣介石先是依違於美蘇兩大強權之間，對於政學系成員的倚賴則是不減反增。在應付美國調處的壓力，以及周旋於中共與蘇聯之間的相關立場上，特別是 1945 年 8 月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月底至 10 月初舉行的國共重慶會談，以及 1946 年 1 月中下旬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的五五憲法草案修改原則與

案》，〈文物圖書〉，筆略稿本，1945 年 12 月 19-22、25 日條。

- 37 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23-148；陶涵 (Jay Taylor) 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2000 年)，頁 147-151。
- 38 透過蔣介石的授權，孫科、王寵惠、吳鐵城、邵才子、王世杰、張厲生、陳布雷、曹震、吳鼎昌等人集議磋商政治協商會議籌開事宜，蔣並且約集五院院長與黨內元老商談政協會議方針。王世杰，《王世杰日記》，冊 5，1945 年 12 月 16 日條，頁 231；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筆略稿本，1945 年 12 月 17、24 日條。又，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5 年 12 月 24 日條，頁 567：「下午中共委員談話會，凡是華黨說話者，可得到鼓掌。邵才子報告與中共談判經過與政治協商會議召集情形，方覺慧對中共談判表示憤怒，而責簽字者負責，引起邵之不滿。」
- 39 美、蘇、國、共四者關係，構成某些學者理解戰後東亞國際關係和中國內戰起源的複雜視角。例如立安立 (Odd A. Westad) 的專著就體現了這種研究觀點與方法，Odd A.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國民大會無形化等問題，在在都使得國民黨內右翼勢力堅信：由於政學系等肩負談判使命的黨內綏靖派一意妥協的結果，國家主權與國民黨的尊嚴簡直已經陷入不可挽回的險境。若就政治人物的意識形態與權力政治的角度而言，中國及國民黨在戰後初期面臨的上述處境，確實有助於 CC 系與黃復青勢力雙方起意重新培育合作的溫床。⁴⁰

1946 年 1 至 2 月間，黨內右翼勢力對於時局的反響，主要是透過三重交叉的指控面向鋪展開來的：一、痛斥國民黨的無能腐化；二、峻拒政協決議以及社會對於國共和解的某種期望；三、忿於蘇聯遲不撤軍東北。1 月上旬開始，CC 系和黃復青的幾名成員商議起草黨政革新方案，位於重慶的中央黨部則是這群人士會商的場所之一。⁴¹黨內右翼的集會通常以黨政革新作為名義，採取介於清談與組織功能之間的座談會機制。起初，座談會似乎只能吸引若干最為熱心的右翼成員參加，十幾個人大概已是出席人數的上限。不過，接著在 2 月份，梁寒操、蕭錚和革新集團的其他要角適時順應許多國民黨人憤慨政協決議的心理，起碼在中央黨部舉行了三次公開的黨政革新座談會：首次計有百餘人應邀出席，第二、三次甚至超過了一百五十人。與會者的身分頗為廣泛，包括國民黨與三青團的中央層級幹部，以及國民參政員、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等。革新集團核心分子之一的鄧飛黃（1895-1953），則以「空前而罕見」的字眼，評價他們在這個月份掀起的座談攻勢。⁴²

擴大後的座談會顯示革新分子趁時採取了招攬政治菁英參與的某種組織性活動，座談會本身成了該組織的名稱：「陪都黨政革新運動座談會」。2 月 27 日，由座談會通過的集團宣言〈我們的呼聲——黨政革新運動〉當中，革

40 參見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和談——以「重慶會談」為例〉，《歷史月刊》，期 89（1995 年 6 月），頁 71-75；林能士，〈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探討〉，《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6 年），頁 920-938；林能士、王良卿，〈戰後國民黨人爭取黨內民主化的背景考察〉，《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557；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13.

41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6 年 1 月 9、22 日條，頁 578、581。

42 詳見鄧飛黃，〈黨政革新運動的經過和要義〉，中國國民黨雲南省執行委員會編，《黨政革新運動》（昆明：編者自印，1946 年），頁 10；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15.

新分子指摘國民黨未能力行主義：論民權主義，只是便宜了土豪劣紳的抬頭、官僚竊弄；論民生主義，只看見官僚資本及其他寄生者。該文也抨擊國民黨的組織已遭官僚主義、派系主義腐蝕，難能承當革命建國的任務。屆此，作為革新陣營最重要的政策性文件，〈我們的呼聲〉正式宣告黨政革新運動的目標是：一、團結革命同志，實行黨內民主；二、打倒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三、肅清官僚主義，實行民主政治；四、發揚民族正氣，保衛國家主權。⁴³第一項目標揭櫫黨內民主，意在分割總裁權力，杜絕第二、三項暗喻的「政治豪門」（孔宋）、「政治捐客」（政學系）等人物動輒規避黨內民意，遂行「政治走私」；第四項旨在反對綏靖路線，實則敵視黨政鴿派與中共、蘇聯。⁴⁴

（二）右翼清議的激昂展示

在 1946 年開頭的兩個月裡，黨內右翼分子在黨內外竭力製造輿論壓力，寄望剷除任何可能因為黨派妥協而招致黨國屈辱的政治因素。他們不僅透過擴大之後的黨政革新座談會爭取政權內部其他幹部的政治支持，也運用古代清議分子慣用的上書、口語抗議等方式，藉以擴展政治效果。例如政協會議期間，陳果夫援引近日法國臨時政府總理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苦於該國政黨紛爭而告辭職一事，函促蔣介石作為殷鑒。陳果夫預言政協會議「必無好結果」，「且無論如何，共黨已得到好處，本黨已受害。」

43 〈我們的呼聲——黨政革新運動〉，1946年2月27日陪都黨政革新運動座談會通過，詳見陪都座談會編，《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重慶：青年軍出版社，1946年），頁1-7；中國國民黨雲南省執行委員會編，《黨政革新運動》，頁1-3；《革新月刊》，創刊號（1946年8月），頁5-7。

44 在革新分子看來，「實行黨內民主」才是兌現他們政見的首要條件，一旦黨內民主管道暢通，那麼其餘三項政見不難期成。參與革新運動的黃宇人指出，主張「團結革命同志，實行黨內民主」的目的，就是想對總裁行使領導權的方式有所限制。他回憶重慶會談與政協會議當中，黨內少數參與機密者「祇對蔣校長負責」、「不惜犧牲國民黨的立場以求與黨派達成某些協議」的情事，堅持：「我們認為唯有恢復黨的民主制度，黨是國是才可望依照大家的公意以行，而使一些官僚政客無法再作『走私』的勾當。『走私』一詞，可說是我當時所發明的，因為這些官僚政客在各種正式會議中，絕少公開的有所主張。他們只是利用與蔣校長接近的關係，隨時向他告密，並相機進言，然後挾他的手諭或面諭以凌人。因此，多數人經過長時間討論所決議的事，往往被他們在付之前片言推翻。國民黨所以日趨衰敗，大半即緣於此。」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14-15。

函中敦勸蔣介石即行改弦易轍，語間並視美國介入調處為大不然：「中國如行多黨政治，照現在黨、政、軍均未健全之際，頗有蹈覆轍之可能。請臨崖勒馬，另行途徑。並勸美國勿誤中國並以自誤為幸。」⁴⁵

政協閉幕未久，國民黨內的小組會議以及非正式的談話會，幾乎都被右翼幹部的激動發言壟斷了。有時候，包括中央秘書長吳鐵城在內的會議主持人，都無從節制會場秩序。出席黨政小組會議的張道藩、谷正綱、徐復觀（1903-1982）猛烈抨擊現狀，話間反映革新陣營視「恢復黨內民主」為救黨良藥的基本立場。他們表示國民黨的一切失敗，均由於不民主，要求黨、總裁給予民主。馴至2月中旬起，蔣介石展開為期近兩週的上海、南京、杭州視察之旅，重慶政壇的躁動情緒隨著領袖離渝而更見熾張。陳布雷向蔣勾繪重慶黨政動態指出，幹部憤激之情，乃至不服領袖羈束的離心傾向，已然頗為昭顯；在政學系要員與孫科、蔣經國等人的內部談話中，陳布雷則是提醒在座者：「國家主義派之激昂，不能輕視。」⁴⁶實即指涉黨內右翼。黨內右翼除了以座談、上書、口語途徑掀起清議之外，為保證己方確是符合公眾意志且收視聽之效，甚至運動群眾，打造具有聲威效果的民意場景，例如2月10日震動中外的較場口事件，以及全國各大城市於下旬蔚起的反蘇聯示威遊行。⁴⁷

作為CC系的領導人，陳果夫、陳立夫沒有置身事外，事實上，兩人還是這股激進政潮的主要指導者，不過，他們頗為謹慎的避免在黨內正式場合與一般公眾面前留下這種印象。⁴⁸倒是在事過境遷的1975年，陳立夫曾向一

45 〈陳果夫先生民國二十五年至四十年日記摺錄〉，徐詠平編著，《陳果夫傳》，1946年1月22日條，頁935。

46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冊5，1946年2月4日條，頁263；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6年2月8日條，頁588；王子壯，《王子壯日記》，冊10，1946年2月11日條，頁509-510；張嘉璈日記，1946年2月15日條，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662；〈陳布雷呈蔣中正本黨的現狀與二中全會之前途〉，1946年2月20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戡亂時期，第41冊，目次號：2；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筆略稿本，1946年2月20日條。

47 李新總編、江朝光著，《中華民國史》，編3卷5（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72-174、443-446。

48 職是之故，外界看待二陳在革新運動裡的角色，多半是那一種想當然的推斷方式。例如重毅編著，《中國各黨派全貌》（南京：民本出版公司，1946年），頁20：「事實上的領導

位美國大學博士生傾訴他眼中的政學系，以及戰後政學系成員走的不智路線：「政學系想和共產黨妥協，想透過商談達成和平協議。我覺得和共產黨妥協是不可能的，和他們商談是錯誤的。共產黨只會趁這個時候滲透你，擴大他們的力量，而且他們從來說話不算話，所以我們談了有什麼好處？」但是，蔣介石卻不盡然同意陳立夫的看法：「立夫，你把政治看得太簡單了。」當陳立夫向這位洋博士生轉述了蔣介石的話後，接著兀自說道：「照我看來，連革命才是簡單的。當你為原則奮鬥的時候，不會跟那些理念相左的人達成協議。當你為原則奮鬥的時候，你就是不妥協。這就是政學系和我之間的主要差別。」⁴⁹

在 1946 年春天，像陳果夫這群衛黨護黨的憂危之士則是認為，國民黨本身的孱弱才是導致政權進退失據、備受屈辱的根本原因。政協甫告閉幕，陳果夫即於 2 月 2 日日記寫道：「吾人辦黨務多年，共黨輩至今尚重視吾人之力量，且不斷向吾人攻擊；但自己檢討一下，頗感慚愧。因黨的組織不如人，黨的宣傳不如人，黨的訓練又不如人，致受共黨甚至其他無人之黨之欺凌侮辱，實在無以對前輩，無以對死者。今後應如何努力，亟須檢討與改進也。」⁵⁰非常自然的，國民黨人從黨內自救著手的改革意識很快就落實在革新陣營月底提出的政治宣言：〈我們的呼聲〉當中，同時也被許多革新分子挾著「清君側」的姿態，帶進了 3 月 1 日開幕的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以下簡稱六屆二中全會）裡。⁵¹

者，據說就是組織部長陳立夫先生……。」根據革新陣營內部的說法，陳果夫、陳立夫在這場運動及其相關政潮當中，扮演積極的指導角色：蔣京訪問、紀錄，《蕭贊育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頁64-65；蕭贊育，〈陳果夫先生與黨內革新運動〉，《梅園文存》（臺北：黎明文化，1985年），頁186-187；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237。

49 陳立夫在 1975 年 5 月 3 日接受聖約翰大學博士生 Charles R. Kitts 的訪問。Charles R. Kitts, "An Inside View of the Kuomintang: Chen Li-fu, 1926-1949," PhD dis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78, p. 115.

50 〈陳果夫先生民國二十五年至四十年日記摺錄〉，徐詠平編著，《陳果夫傳》，1946 年 2 月 2 日條，頁 935。

51 關於六屆二中全會的專文研究，參見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349-381；鄧野，〈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研究〉，《歷史研究》，2000年期1（2000年2月），頁3-20；汪朝光，〈戰後國民黨對共政策的重要轉折——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再研究〉，《歷史研究》，2001年期4（2001

(三) 六屆二中全會

驗諸二中全會的實際表現，陳布雷先前提醒蔣介石有關黨內憤激情緒勢必導致二中全會「爭辯發洩」的預測，的確是被證實了。⁵²一方面，革新陣營在二中全會要求實施黨政改革，並且全面清算黨政現有作為，例如從官僚資本主義的流弊到土地改革的失敗，從政權的官僚主義積習到外交政策的失當等等。另一方面，他們也攻擊政協決議，要求大會拒絕承認，或者給予有條件的接受。在會議進行期間，至少有下列黨政官員遭到直指人身的強烈抨擊或者罷免的動議：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杰、經濟部長翁文灝、財政部長俞鴻鈞（1899-1966），重慶市街同時廣布「打倒張群」標語，東北人士團體向大會請願要求懲辦熊式輝，大會出席代表私下接獲攻擊陳儀治台的黑函。總之，政學系要員盡成眾矢之的，宋子文則是繼孔祥熙之後，被激進黨人視為官僚資本主義的又一化身。⁵³

如果只以革新陣營渴望清理門戶的心理評估他們在二中全會的成就，實則毫無成績可言：吳鐵城繼續保持黨的秘書長位子，沒有哪個被指控的官員在稍後國民政府改組之時失去原有的政府職務。翁文灝也許是個例外，但他卻是升任了行政院副院長。實質上，這些黨政官員的政治權力等於直接來自蔣介石的授與，革新陣營針對這些政治代理人的恣意攻擊，等於平添了蔣介石的莫大困擾。3月11日，在二中全會舉行的總理紀念週上，蔣介石就針對全會開幕以來的種種猜忌攻訐行為表達了不以為然的態度。依據蔣介石的觀點，革命黨歷久彌新的首要基礎是「發揚黨德」，至於同志的互信與黨的共信則是檢驗黨德發揚與否的具體標準，但是二中全會會場的表現，證明一天跌落一天的黨人互信至此已經完全喪失了。⁵⁴

蔣介石在紀念週上的講詞出現了「革新」的字眼，不過卻是據此要求革

年8月)，頁72-87。基本上，兩名學者感興趣的是六屆二中全會與國共政局的關係，特別是對於國共關係的影響。

52 〈陳布雷呈蔣中正本黨的現狀與二中全會之前途〉，1946年2月20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53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239-240。

54 蔣中正，〈革新黨務之要道〉，1946年3月11日在六屆二中全會紀念週講詞，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1（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268-269。

新陣營反求諸己，盼望「由我們個人的革新，而促成全黨的革新」。稍早（6日），蔣介石接見十一名革新陣營代表時，就曾樂許黨人革新，但他也表達了應該腳踏實地，勿作空泛之語的類似立場。這十一位求見總裁的代表是革新分子在4日晚間餐聚當中公推產生的，餐聚地點在陳誠（1898-1965）寓宅，三十餘人參加，邀請人則是陳誠與陳立夫。餐會受邀人士侃侃談論著「團結」作為革新運動前提的重要性，谷正綱甚至直接要求陳誠和陳立夫進行合作。事實上，這裡的「團結」指的是革新陣營的團結，並不包括團結革新分子眼中的敗黨者。在11日的紀念週上，蔣介石則是繼續提醒在場幹部注意「我們革命黨是整條的」、「卅志之間，榮辱成敗是一致」的，他同時援引韓愈（768-824）〈原毀〉的著名警句，訓道：「古人說：『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我們革命黨員，決不能流於這種惡習。今天誰是負責努力的卅志，我就佩服誰。如果革命工作，單憑空口說幾句激昂痛快的話，就可以完成，那我們那一個人不可以輕易的做這個好漢？那一個人不善於說幾句激昂痛快的話呢？然而這與大事有什麼補益？」⁵⁵

儘管革新陣營清理門戶的願望未能實現，他們仍然另有斬獲。第一、在有關政協決議五五憲草修改原則的重大問題上，革新陣營成功催使二中全會發表了頗具國民黨本位的政治立場。事實上，這項立場和蔣介石的願望也是一致的。早在政協會議閉幕之後，蔣介石即曾向孫科、居正（1876-1951）、于右任（1879-1964）等人闡發他個人保全建國大綱、五權憲法精神的決心。在蔣與護黨人士看來，孫中山遺教建構的政制藍圖曾經體現在〈五五憲草〉

55 3月4日晚間革新陣營餐聚，詳見王子壯，《王子壯日記》，冊10，1946年3月4日條，頁536；「上星期反省錄」（3月9日至3月10日間），頁542-543。3月6日，蔣介石接見黨政革新運動代表，並聽取名員意見。代表之一的鄧飛黃指出「總裁聽我們陳述之後，以表示嘉許」，事略稿本則是記道：「公以其所陳類多空泛，當經指示須腳踏實地，才圖革新。」鄧飛黃，〈黨政革新運動的經過和要義〉，頁11；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事略稿本，1946年3月6日條。蔣介石在11日總理紀念週的講詞：蔣中正，〈革新黨務之要道〉，1946年3月11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1，頁268-272。本次紀念週並參見王世杰、張嘉璈、唐縱、李漢魂、王子壯日記，1946年3月11日條；王世杰，《王世杰日記》，冊5，頁284-285；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頁682；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頁598；朱振聲編纂、黃晃校勘，《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冊2（香港：李氏後人自印，1975年），頁292；王子壯，《王子壯日記》，冊10，頁545。

裡，但這時卻被政協會議通過的修改原則翻整得面目全非了。⁵⁶正是承接了這股強烈的護黨情緒，3月16日，二中全會通過對於政協問題的決議案，申明：「所有對於五五憲草之任何修正意見，皆應依照建國大綱與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而擬訂，提交國民大會討論法定，庶憲政之良規得以永久奠定。」⁵⁷同日，另份決議則是更具體的堅持國民大會應為有形組織，省無須制定省憲等等，凡此種種，均與政協決議精神出入甚大。

革新陣營的第二項斬獲是關於黨內民主的若干成果，例如藉由強化中央常會職能，針對蔣介石人身統攝的領導風格給予若干限制。二中全會通過〈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即規定「中共重要決策，應先經中共常會商討法定後呈總裁核定」、「總裁對重大問題之指示，先交中共常會研議實施。」⁵⁸為了符合革新陣營強化中央常會職能的基本立意，中常委產生方式顯然有必要採行更為民主的辦法，俾便大幅降低總裁左右人選的可能性。自從1942年五屆十中全會之後，國民黨中常委的產生方式，雖有記名選舉之實，但是透過蔣介石預先提出候選名單，實際仍係總裁個人意志的表現。在1946年的二中全會幕後，蔣介石似乎是為了緩解黨內龐大的清議壓力，於是答應了革新陣營所堅持的：依據中央委員的自由意志，開放選舉中常委；另一方面，為了擴大黨內參與，本次中常委選舉名額也增為三十六名。⁵⁹

56 詳見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筆略稿本，1946年2月10日條。參見筆略稿本，1月31日、2月2日條；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6年2月10、23日條，頁589、592-593；蔣中正，〈革新黨務之要道〉，1946年3月11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1，頁272。

57 榮孟源主編、孫彩霞編輯，《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共全會資料》，下冊，頁1048；江朝光，〈戰後國民黨對共政策的重要轉折——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再研究〉，《歷史研究》，頁84。

58 榮孟源主編、孫彩霞編輯，《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共全會資料》，下冊，頁1038。

59 無論如何，蔣介石以集權揉雜民主的個人態度並未改變。革新陣營的骨幹黃宇人中憶此時他們曾向蔣介石陳述強化黨內民主的看法，蔣雖未表示反對，卻再現不豫，強調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權制，黨人主張民主固無不可，但不能因民主而忘了集權。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16。3月13日晚間，蔣介石主持二中全會主席團會報，政協會議國民黨方面代表亦在場。張道藩等人堅持中常委須由選舉方法產生，不日蔣提出候選名單。根據王世杰的記載，蔣介石「勉強應允之」。接著，在場人士針對記名／無記名投票兩種方式有了歧見，陳立夫主張記名投票，王世杰主張無記名投票，後者勝出。

選舉之前，革新陣營內部舉行了一次假投票，用以推出一份競選名單，供作同人配票依據。⁶⁰選舉結果，革新陣營堪稱最大贏家，某些特殊現象也可徵見國民黨人難以言喻的躁動情緒：第一、CC 系成員谷正綱、蕭同茲（1895-1974）、賴璉、田崑山（1891-1959）、蕭錚在各自的政治生涯當中首次成為中常委，連同本次獲選續任的派系同僚陳果夫、陳立夫、張道藩、潘公展，九員合居中常委選出名額四分之一，常會席次比例高達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時期之最；第二、黃復青勢力也有六人入列，占中常委選出名額六分之一，此為國民黨改組後二十二年間未有之事；第三、多名親炙 CC，或是和 CC 採取合作立場的革新運動中堅分子均告當選，其中包括抗戰之前具有反蔣經歷的改組派健將朱霽青（1882-1955）、白雲梯（1894-1980），以及長期跟隨孫科的梁寒操等人；第四、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1893-1981）根本是未預黨務的，與國民黨官方之間的政治距離亦遠，但是二中全會的中央委員還是逕自將她選為中常委（雖然宋慶齡爾後並未執行這份首次獲得的「榮譽」）。⁶¹至於那些飽經中央全會清議波及的政治人物：宋子文續告當選，然而排序明顯下滑；和去年選舉相同的是，政學系相關勢力仍然只有吳鐵城一

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事略稿本，1946年3月13日條；王世杰，《王世杰日記》，冊5，1946年3月13日條，頁285-286。3月14日，二中全會通過中常委選舉採取無記名限制連記選舉法，《中央日報》（南京），1946年3月15日。1942年五屆十中全會之後，中常委日總裁提出候選名單並以記名選舉產生，參見：榮孟源主編、孫彩霞編輯，《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共全會資料》，下冊，頁606、804-805；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頁136-137；王世杰，《王世杰日記》，冊4，1944年5月24日條，頁318-319。

60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17。參見王子壯，《王子壯日記》，冊10，〈上星期反省錄〉，1946年3月23至24日間，頁556。

61 朱霽青、白雲梯與改組派的關係：武和軒，〈我對改組派的一知半解〉，《口史資料選輯》，輯36（1963年6月），頁142、146；范可遂，〈九十回顧〉，《口史資料選輯》，輯16（1985年5月），頁11-13；范可遂，〈我所知道的改組派〉，《口史資料選輯》，輯45（1964年4月），頁216、218、230；陳公博，〈改組派的史實〉，《寒風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4年），頁甲276。東北籍的朱霽青對於東北接收人專問題頗表不滿，非難熊式輝，語極諷刺：朱霽青，〈政治設施〉，《朱霽青先生紀念集》（臺北：未載出版社，1955年），頁78。梁寒操長期跟隨孫科，抗戰期間並在國民黨資助的中山學社裡頭，與CC系的徐恩曾等人共負責社務。在抗戰後期黨人醞釀革新之時，梁寒操是CC系跨出己方陣營最先爭取到的一批黨外幹部。關於梁寒操，參見胡彥雲，〈我所知道的梁寒操〉，《口史資料選輯》，總輯138（2000年1月），頁31-44。

人在榜。⁶²

(四) 從陪都到首都：運動的常態組織化

由於國民政府即將還都南京，革新分子除了準備將他們的政見攜回首都繼續奮鬥，也思索如何在各省推進工作。同時，爲了拓展革新陣營的底層基礎，革新分子也考慮在地方廣泛吸收國民黨與三青團的成員，以保證形成一場全面的改革浪潮，而非局限在菁英幹部之間。二中全會閉幕四日後，即 3 月 21 日，革新陣營邀請留在重慶的中央委員，於中央黨部大禮堂聚會。與會者認爲，現在已到了將革新運動推展至地方的時機，並且大可採取公開的方式，普遍進行。會中延續了月來革新分子高亢的情緒，以及藉由這項政治運動替國民黨帶來集體穩定秩序的想像式熱情。包括余井塘、潘公展、張道藩在內的幾名 CC 系幹部發言指出，他們所致力於的這場政治運動，目的在於完成國民黨的大團結，當然，重點是要實踐革新的訴求，掃除黨的「渣滓」。谷正綱則在會上回顧了二中全會的成就。在他看來，全會不僅發揮了民主精神，同時也充分復甦了國民黨人沉寂已久的革命意志。⁶³

很快的，革新陣營提出了開展運動的指導性綱領。4 月 12 日，重慶的座談會通過一項〈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暫行綱領〉，⁶⁴規定在首都及中國各地普遍成立革新運動的座談會，並對所有願意擁護革新政見的國民黨黨員、三青團團員，表達歡迎加入之意。爲了確保加入者的向心力，〈暫行綱領〉要求革新運動成員必須遵行座談會的決議，此外，無故連續三次未出席集會者，將被視爲自動脫離座談會團體。〈暫行綱領〉也正式賦予「座談會」一個具有常態性機制的執行功能，而不再僅是臨時供人放言高論的座談場合。這份文件替設想中的常態性組織規劃出一個粗略的規模：無論中央或是地方的座談會組織，均由某種形式的大會選任若干「召集人」；各座談會設「組」處理具體事務，設置各種「研究會」研究政經實際問題；並由召集人會

62 有關常委名單、排序及派系屬性，參見林能士、王良卿，〈戰後國民黨人爭奪黨內民主化的背景考察〉，《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567。

63 《中央日報》，1946 年 3 月 22 日。

64 〈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暫行綱領〉，見陪都座談會編，《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頁 11-12；中國國民黨雲南省執行委員會編，《黨政革新運動》，頁 5。

議聘用一名「總幹事」，以便負責預期中的龐雜會務。⁶⁵

國民政府於5月份正式返回睽違八年多的南京，即所謂「還都」。革新陣營立即根據〈暫行綱領〉開展組織與宣傳工作。在南京，首都的座談會於官方還都後的一個月內，即已成立黨務、政治、經濟、外交、特種五個研究會。這些研究會不定期的舉行內部討論，針對所司議題提供建言。各個研究會歷次的與會者人數多寡不等，約計二十餘人到四十餘人之譜。基本上，這類內部討論的發言內容，並未超出革新分子在重慶時期所勾勒的政見範圍。以首都座談會的政治研究會為例，會中再度強調引進新人才的必要；經濟研究會的與會者則在幾次的集會當中，持續抨擊官僚資本，並對戰後中國的物資生產及穩定幣值等問題提出因應之道。⁶⁶

稍早，重慶二中全會的騷動實況經由一些出席代表帶回地方進行口語傳播之後，革新運動才算是讓國民黨的地方基層留下初步印象。等到4月份〈暫行綱領〉明定了革新運動的組織策略，特別是翌月國府正式還都南京之後，革新分子開始加快喚醒世論，並且逐漸將運動攜往地方。這年夏天，中國各地經常出現革新分子的宣傳活動。在南京，首都的座談會除了率先成立幾個研究會之外，還經常廣邀特定人士面敘，以期推廣革新陣營的理念。例如5月份，首都座談會在中央黨部大禮堂以茶會招待二百餘名國大代表，梁寒操和余井塘代表革新陣營向與會者介紹了這個新起的政治運動。7月份，革新陣營則邀請二百餘名來自區黨部的基層幹部，會中，梁寒操繼續宣揚革新運動的政治理念，並且向與會的國民黨基層幹部表達了希望將革新運動擴及各個省縣市的願望。⁶⁷

（五）將運動攜往地方

整個夏天，在CC系幹部以及他們能夠支配的地方黨部的積極推動之

65 陪都座談會編，《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頁11；中國國民黨雲南省執行委員會編，《黨政革新運動》，頁5。

66 《中央日報》，1946年6月12、19、21日；〈革新動態〉，《革新月刊》，創刊號，頁13-14。余井塘、范子遂、王培仁、倪立亞、譙小岑、劉衛靜……等人曾參與黨務研究會；劉健詳、蕭贊育、鄧飛黃、范揚、史尚寬、楊幼焜、陳方……等人曾參與政治研究會；向浩若、宋述樵、蕭銻、賀袁寒、沈重宇、劉子亞……等人曾參與經濟研究會。

67 《中央日報》，1946年5月15日；〈革新動態〉，《革新月刊》，創刊號，頁14。

下，中國各地紛紛複製首都革新陣營的運動模式，成立了各自的座談會。透過 CC 系分子的居間主導，地方黨機器率多利用公部門的力量承命推展，導致革新運動儼然成了一場全國性的事務，以及和黨、政的官方使命混淆不清的東西。以湖南省為例，包括省黨部書記長莫萱元（〔1909-1983〕，CC 系分子）在內，多位幹部迭次在省黨部或省政府的總理紀念週上，闡釋革新運動的要義。湖南省黨部並且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將省內幾個主要的職業領域與公家單位（例如長沙文化界與省幹訓團）予以動員、組織，逐一成立單元性的座談會。當湖南省內的革新運動累積到一定的勢頭之後，在 8 月份，由莫萱元、劉公武、張雲漢（1911-？）分別代表國民黨、省政府、三青團三方面，聯名函邀省內八十餘名來自國民黨、政府、軍隊、三青團的地方菁英，在省黨部舉行全省首次黨政革新座談會。⁶⁸

這類地方座談會的第一次議程，大抵都是先由會議主席報告革新運動的發起意義，接著讓與會者發言，陳述各自的改革觀點。會中並且依循〈暫行綱領〉的規定，推選象徵當地革新運動最高領導身分的「召集人」。獲選者多半是地方黨政要人，或是有力鄉紳，名額各地不一：例如湖南省座談會推選九名；6 月份，二百餘人到場的上海市第一次座談會，推定十五名召集人；8 月份，同樣有二百餘人參加的貴州省座談會，則推選出三十一名召集人。⁶⁹

湖南全省第一次黨政革新座談會結束後五日，九名召集人舉行首次內部會議。莫萱元同列召集人之林，並獲召集人會議委兼湖南省座談會總幹事一職，其本職所在的省黨部，也經召集人會議決議，作為座談會辦事處的場址；召集人會議同時要求湖南省黨部、省政府、支團部各調職員一人，經常到處辦公；九名召集人並且聯名具函省內各縣市黨政團首長，籲請響應推進縣級

68 詳見《革新月刊》，創刊號，頁 8-11、14-16、19，與《革新月刊》，期 2（1946 年 9 月），頁 19 等報導。莫萱元是湖南省黨部書記長，劉公武為湖南省政府秘書長，張雲漢是湖南支團部幹事。

69 上海第一次的座談於 6 月 26 日舉行，會中推定十五名召集人：陸京士、朱學範、陶百川、陳保泰、駱清華、馮有真、徐則讓、沈鼎、鄭傑、蔣建白、李灝、姜豪、陸蔭初、邱希聖、何元明。貴州省則於 8 月 5 日推定三十一名召集人，包括唐伯敏、楊森、李天行、平剛、何輯王、傅啟學、馮定詳、袁平凡等人。詳見〈革新動態〉，《革新月刊》，創刊號，頁 14-15，與《革新月刊》，期 2，頁 18。

革新運動，組織縣市層級的革新座談會。⁷⁰召集人會議的呼籲很快獲得了省內各地的回應。從8月份開始，整個下半年，湖南各縣市的座談會組織有如蜂巢般的不斷增生。當然，它們仍然大體複製了長沙省級座談會的組織、運作模式，一如長沙早先複製了首都南京的模式。⁷¹

爲了宣揚理念，革新陣營也公開發行一些期刊。7月下旬在南京，首都座談會創辦了一份名爲「革新」的周刊，梁寒操是這份機關刊物的發行人，楊幼炯（1901-1973）擔任總編輯，總經理馬星野（1909-1991）。⁷²數日後，湖南省的革新分子也以「革新」爲名，發行月刊，以資桴鼓相應。人們可以輕易發現這份地方版《革新月刊》幕後的黨部操持色彩：月刊社址就設在長沙的湖南省黨部內，省黨部書記長莫萱元（也是湖南省座談會召集人兼總幹事）擔任發行人，省黨部多名幹部則執掌實際編務。湖南省黨部主任委員張炯（1879-1958）貢獻了創刊詞，這名CC系的地方要角疾呼國民黨人應該「共矢忠貞，造成普遍熱烈的洪流，來推動一切，改革一切，然後本黨才有辦法，國家才有光明的前途。」⁷³

1946年的夏冬之間，各地的座談會與革新刊物接踵出現。革新分子渴望建立一個光明的嶄新中國，至於光明之源，毫無疑問，「自必」來自於革新運動。湖南的《革新月刊》數期封面圖案設計，就透現出這種光明之源的化身思維。例如第二期封面主題是一座線條剛直的吼獅雕像、第五期則是一座發光的燈塔、第六期是拳擊火炬的畫面等等。這種訴諸光明、熱情的思維，同樣可見於刊物內文當中。頭幾期的《革新月刊》充斥著關於革新議題的論述，並且夾帶著大量、激昂的寫作情緒，同時，編輯部也刊載了革新運動的幾篇綱領性文件，藉以指導工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47年，這種喧囂式的運動型文章慢慢減少了，月刊編者開闢更多非關革新議題的版面，這

70 〈革新動態〉，《革新月刊》，期2，頁19-20。湖南省座談會召集人：莫萱元、劉公武、陳大榕、蔣伏生、唐天賢、黃芫軒、匡立炳、王鳳喈、魏業坤；三名候補召集人：王原一、劉儋如、張雲漢。

71 詳見《革新月刊》各期報導。

72 《中央日報》，1946年7月26日、8月3日；〈革新動態〉，《革新月刊》，期2，頁18。

73 湖南《革新月刊》於1946年8月1日創刊。發行人莫萱元；社長鄭天健，後為羅樹立；楊樹棠、吳伯卿擔任過主編。張炯，〈現階段的黨政革新運動——代創刊之辭〉，《革新月刊》，創刊號，頁2。

使得《革新月刊》由原本的政論性質緩步的蛻化爲一本綜合性刊物。例如第六期兩位作者對新演劇運動寄予關心；第九期一位作者以說理的口吻頌揚黃昏；第十六期一篇充滿想像力的極短篇小說，則將蘇武（140 -60 B.C.）寫成一個動輒找羊隻自說自話的孤獨牧者。⁷⁴

期刊內容的變化，不是孤立的現象。即便在組織與議題設定上，革新運動愈往地方下層，也愈有瑣碎化、地方事務化的傾向。基層的縣級座談會往往討論的，是如何加強守時觀念、擴大禁煙及兵役宣傳、推行集團結婚、籌備元旦聚餐、公共房舍分配、實施鄉約族規等問題。在湖南省的沅陵縣，當地座談會爲促進民眾守時觀念，甚至議決商請湘西電廠每日定時鳴放汽笛，並由縣參議會與三青團鳴放午炮。⁷⁵基層座談會隱然成爲地方黨政部門某種非正規的聯席會，與會者在這個體制外場合，解決一些跨部門的瑣碎事務或聯誼事宜。至於革新陣營原本高懸的政策性理想，則逐漸被人淡忘。

如果革新分子能夠利用基層的座談會對地方黨政建立起支配性的力量，那麼革新陣營將是戰後中國一支不可輕忽的政治勢力。然而事實與此相乖。在國民黨治理下的中國，地方的黨政聯席會議才是公部門定期舉行的一種正規溝通管道，但成效始終不彰，黨政關係也難能穩定。⁷⁶至於革新分子所設計的地方座談會，無論在形式上的地位，或是實際的成就上，無從，也根本未能取代原本已告孱弱的地方聯席會議。地方黨人對於革新運動的熱忱，隨著時日的流逝，再也不復既往。在南京，革新陣營已經察覺革新運動似有沉寂之勢。1946年11月，在梁寒操家中舉行的革新座談會上，大約二十名國民黨少壯中央委員不滿於革新運動日趨消極，有人主張以行動挽回聲勢，有人主張加強宣傳，有人則認爲應從社會文化思想方面著手。包括若干黃復青背景在內的出席者（諸如賀衷寒、唐縱等人）紛紛各抒己見，但並未獲得建

74 《革新月刊》，名處。1947年的幾篇文章：羅樹力，〈展望湘垣劇運——行健劇社第二次演出以後〉，高宇，〈戲劇革新之路〉，均刊於期6（1947年1月），頁19-22；栗青岩，〈黃昏讚〉，刊於期9（1947年4月），頁22-23；舒紹祥，〈北海草原〉，刊於期16（1947年11月），頁21。參見〈本刊啟事〉，《革新月刊》，期9，頁18。

75 詳見〈革新動態〉，《革新月刊》，期2，頁21，與期5（1946年12月），頁20-21。

76 關於地方的黨政關係與黨政聯席會議等機制：李雲漢，〈抗戰期間的黨政關係（1937-1945）〉，《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1-19；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126-128。

設性的共識，整晚的聚會似乎也就成了一群失意者一澆胸中塊壘的場合。⁷⁷

四、革新運動的落幕

（一）宗派主義與官僚主義

儘管革新運動強調「團結同志」的重要性，但事實上，革新陣營內部從來就不是一個緊密的政治組合。當運動發起之初，CC系、黃復青分子小心翼翼地試探合作的可能性時，他們其實無能、也無意將這種脆弱的派系合作雛型，導向國民黨與三青團的和解。相反的，在兩派有限的利益交集之外，基於本位主義及攘奪政治資源而起的衝突仍然不斷。在中央，六屆二中全會曾經讓人們訝異於CC和黃復青聯手之快速，但全會閉幕後，一度傳出陳立夫將改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谷正綱接任中央組織部長，團方聞訊，激烈反對，認為中央黨部勢將由CC系包辦。這顯示出，即使在中央，革新陣營內的派系合作氣氛，往往仍須經受各種政治利益的誘惑與試煉。⁷⁸

同樣的，國民黨與三青團的相互仇視，可能才是革新陣營無法在地方建立最低限度內部整合的原因。1946年間各地參議會選舉，國民黨與三青團各自依恃組織，進行惡性競爭；同年夏天，當革新運動開始向地方推展工作之際，正好也是三青團基層倡議組黨之聲最盛的時候。9月，三青團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自地方與學校的與會代表強烈要求三青團組建成一個真正的政黨。如果大會進行表決，組黨派很可能實現願望，然而身兼團長的蔣介石以個人威權止息了這場鼓噪。儘管不少人認為蔣在事前曾經暗示個人支持三青團組黨的意向，不過三青團最後仍然未能取得真正的政黨名義，從某種角度來說，只是更加坐實了自主獨立的性格。值得玩味的是，無論是地方選舉惡鬥，或是打算擺脫國民黨的羈絆，另行成立一個新黨，三青團都對國民黨進行了毫不保留的批判與謾罵，國民黨亦慣以敵對態度回擊。⁷⁹

77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6年11月5日條，頁654。

78 根據黃宇人的回憶，團方分子得知此人事洩聲，「立即暴跳起來」，尤以鄭介民態度最為激烈。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21-22。

79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273-315、441-442。

即使是革新陣營中人也終於發現，他們致力剷除的宗派主義，其實恰恰正是革新運動內部始終揮之不去，根深柢固的負面資產。依照革新運動原先訴諸的黨團合作理想，上海市也許是這場運動最富希望的一塊實驗地，因為吳紹澍在這座城市同時兼有市黨部主任委員、支團部主任二職。但是由於親朱家驊的吳紹澍，與上海CC系（主要指吳開先、陸京士〔1906-1983〕等勢力）、幫會方面的長期矛盾，吳紹澍先是在1946年初失去了戰後接收初期所獲的副市長、社會局長職位；4月間，吳紹澍在寓所附近驚險的逃過一次預謀式的槍擊；隨後在市參議會的第一輪議長選舉中，親吳紹澍的市參議員以「繳白卷」的方式消極抵制CC；接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以黨、團負責人不能由一人兼理為由，免去吳紹澍的市黨部主委職務，改以CC要員方治（1896-1989）接充。⁸⁰

1946年夏季的陝西省第一屆黨員代表大會紛爭，同樣抵銷了革新運動原本訴諸的高貴理想。陝西省黨部打算透過這次大會，選出省的執行、監察委員，以落實國民黨幾年來斷斷續續推動的下級黨部選舉制度。毫無疑問，這也是革新運動的一項重要政見。然而和國民黨習見的選舉經驗一樣，這次大會仍舊陷入混亂脫序的局面。黃復青勢力結合朱家驊派，聲稱必欲打倒CC系把持的省黨部。不過，反對派的這項願望用以自壯聲勢的成分居多，因為大會出席代表至少八成誼屬CC。首日議程中，一名復興社背景的出席代表領頭抨擊了省黨部的人事問題與工作績效，會場秩序至是失控。接著，反對派在胡宗南（〔1896-1962〕，陝西黃復青勢力最重要的政治奧援者）對黨方保證會議可以正常召開的壓力之下，只能傾全力將兩名同志經由選舉程序送進省的執行委員會，並且帶著些許阿Q式的精神勝利意味，自詡打破了黨方

80 詳見姜夢麟、毛子佩，〈抗戰勝利後上海國民黨支部的派系鬥爭〉，《文史資料選輯》，總輯27（1979年10月），特別是頁183-184；並參見徐鑄成，〈吳紹澍在解放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總輯27（1979年10月），頁186。關於吳紹澍在1946年4月的槍擊事件，一些作者對此表明，導因於吳紹澍與陸京士、杜月笙的摩擦。劉才賦，〈通天教主——杜月笙與國民黨政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30-237；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22-123；參見翊勳，〈蔣黨真相〉（山東：新華書店，1948年），頁166-168。

「清一色」包辦的企圖。⁸¹

下級黨部選舉問題所蘊藏的黨內民主精神，曾經在國民政府還都之前，由國民黨中央擬就的〈黨務改革方案實施辦法〉當中，再次具體申明。這份方案緣起於去年六全大會閉幕後，蔣介石飭令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要求就黨的缺失及改進意見，擬具方案呈核。其間，方案添納了革新陣營在二中全會裡獲致的具體成就，包括改善中央常會功能、推動下級黨部選舉，以發揮黨內民主精神等等。然而，根據蔣介石對方案的批示與圈點，他對案文建議成立的「幹部選拔委員會」一節，興趣明顯高於其他各節。大體看來，〈黨務改革方案實施辦法〉的醞釀與成形，至少顯示了，蔣介石早在革新運動發起之前，即已留心黨務改革的必要。不過，方案儘管納入了一些主流的改革呼聲，通篇內容仍然規避了如何面對宗派主義這類令人頭疼的根本問題。這使得案文所構想的幹部選拔委員會，以及諸如黨部選舉等技術興革事宜，注定無法在一個資源合理分配的前提環境下順利運行。⁸²

在千夫所指的官僚主義問題上，國民黨機器也面臨無力處理的窘狀。當官僚主義在二中全會上，被黨的右翼分子化約成爲對於政學系的「人事指控」問題時，這類抨擊才顯得生氣勃勃，彷彿非常富有「政治正確」的色彩。然而當會議鋒頭過後，黨機器回頭準備大刀闊斧處理官僚主義的大包袱，才發現這終究是個深層的「集體文化」問題。在這個面向上，官僚主義其實是一種結構現象，沒法子輕率找出一個倒楣的、具體的替罪羊。黨機器的尷尬與無力，立刻顯示在二中全會相關提案的後續處理過程。例如任卓宣（1896-1990）等人曾在全會當中提出〈肅清官僚主義案〉，全會最後只以「交常會注意」五字決議，簡單帶過。全會閉幕後，中央常會接到上述五字任務提示，隨即仿照全會的處理模式，對此案決議七字：「交有關部會注意」。⁸³

81 詳見馬建中，〈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派系鬥爭（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西安文史資料》，輯4（1983年6月），頁95-98。

82 〈蔣總裁批吳秘書長鐵城簽黨務改革方案實施辦法呈〉、〈黨務改革方案實施辦法〉，1946年，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案》，6.3/53.12。

83 〈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交下各提案處理辦法表〉，1946年，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案》，6.3/43.7；第26次會議，1946年4月1-2日，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臺北：編者印行，1954年），頁196。

這樣，任卓宣等人的諤諤之聲，只得繼續隨著國民黨的公文交辦程序，旅行至一級又一級的黨機器會議桌上。實際上，黨機器是拿官僚主義來處理〈肅清官僚主義案〉了。

（二）蔣介石的角色

中國歷代的變法，往往視君主的意願決心為轉移。革新陣營同樣了解，革新運動若要期望有成，蔣介石的意願決心顯然是個重要關節。儘管蔣介石常常聲明他的改革決心，不過由於革新運動部分地挑戰了蔣介石的權力廣度，同時也對蔣介石所倚重的一些政治官僚，形同投下「不信任票」，因此蔣和革新分子的關係也就遠非「贊助」、「不贊助」的二樞態度所能輕易、片面解釋。毋寧說，革新陣營對於蔣介石，往往同時抱持著各類分歧雜錯的感受：或支持、或抱怨、或推促、或質疑，甚至（也許他們從未如此描述過）：或敵、或友。種種雜錯的矛盾感受，隨之反映在革新分子的公開言論上。例如1946年正逢蔣介石六秩壽辰，黃復青勢力掌控的拔提書局特意出版祝壽文集。書中，任卓宣（葉青）費勁蒐羅了蔣歷年來批評黨務的言論，用以彰顯蔣的改革決心。文章末了暗示，其實革新陣營念茲在茲的，和蔣介石並無二致：

總括看來，蔣主席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指示非常之多，而且很完全。舉凡黨、黨員、幹部、黨部、紀律、組織、訓練、宣傳、民運、工作、主義都一一說到了。他底指示，不僅正確而精刻，且時又切實可行，無不合於現在的需要。黨非革新不可。革新運動已開始了。我把蔣主席底指示研究以後，覺得他是主張革新很早的人。今年發起的革新運動，完全與他底指示相合。能夠實行他底指示，革新運動就可成功。⁸⁴

任卓宣的話語必須從反向解讀。儘管蔣介石從未遏制革新分子在各地推展政見的努力，但革新陣營也深知，總裁始終沒有給予革新運動某種深刻的同情

84 葉青，〈蔣主席對於中國國民黨之指示〉，李旭生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與蔣主席》（南京：拔提書局，1946年），頁341。

或支持。⁸⁵在成員眼見運動欠缺具體成果而漸感躁急之際，蔣介石不免成爲眾所抱怨的目標。即使是 CC 系的領導人陳果夫、陳立夫，也從不掩飾他們對於官僚資本，以及行政院長宋子文治下經濟政策的不滿。⁸⁶ 1946 年夏天，革新陣營公開悲歎官僚資本去之不易，梁寒操、余井塘、賴璉等人對於官僚資本的「後台」之硬，頗有感慨。在南京，湖南《中央日報》記者當即錄下了這些政治菁英的無力感受：「所謂官僚資本，類如長江揚子兩公司，實不應使其繼續存在；然今日最銷行於各地之金印牌瀘瀘涕，即爲揚子公司獨家經理，到處有油漆之特大廣告，光可鑑人，安能鋤而去之。且兩家經理爲孔令侃宋子良，論其個人，來歷更大。革新運動所將遭遇之阻力，可以知其大矣。」梁寒操並且題贈這名黨報記者絕句一首，用遣情懷：

十年世變千秋劇，三月春光此日多；
濁酒難教人盡醉，不堪醒眼看山河。⁸⁷

雖然抱怨者仍能在一定的範圍內自由發抒他們的牢騷，但還是無法在政見立場上得到層峰的銳意支持，特別是始終指摘甚烈的人事不臧問題。另一方面，同樣有人拿人事不臧的指控、「敗壞了黨」的帽子，歸諸這些本位意識強烈的黨右翼分子。蔣介石面臨又一方的指控，同樣亦需謹慎將事。二中全會閉幕之後，蔣介石擬將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陳果夫調離中央，轉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此舉可能與黨內右翼分子自年初衍至二中全會的一連串騷動，使

85 賴景瑚，〈辦黨、辦報、辦學〉，《煙雲思往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頁156；余井塘，〈賴景瑚的一生〉，《傳記文學》，卷43期3（1983年9月），頁11-12。賴景瑚，即賴璉。

86 例如陳果夫日記，1945年10月28日條，頁932-933所載：「與宋子文談經濟事。余以農行事請示，並謂如何與棉業、紡織業之業者設法配合。宋謂：現在只有以外棉壓倒華棉之債，以外米壓倒華米之債，不能在此一年半之內言建設。談次，頗自負，謂經濟惟有此辦法。不知此種經濟政策逐步走上資本個人主義，足以造成共黨之禍，而國事亦將爲之斷送，可爲慨歎。」又，張嘉璈日記，上冊，1946年11月12日條，頁765所載：「立夫兄談話，批評宋子文之經濟政策：（1）緊縮生產貸款，使生產萎縮，益增通貨膨脹。（2）對於國貨工業，認爲無足重輕。（3）國家專重營利。」參見溟飛，〈南京觀感〉，《中央日報》（湖南），1946年8月6日。

87 溟飛，〈南京觀感〉，《中央日報》（湖南），1946年8月6日。

得蔣介石拮於應付美國特使馬歇爾的壓力有關。⁸⁸調遣 CC 系領導人陳果夫主政浙江，可緩美方壓力，對陳亦可迴護、安撫。然而陳果夫董理農行不過歷時五月，隱有閑置感受，聽聞蔣言，一時牽動情緒：

總裁召見，謂浙江黃季寬〔黃紹竑〕決辭職，擬改組，並詢我意見。余答：現在可當主席之人不少。余身體尚未全愈。此時去任此職，一若前年之任組織部長，身體即無好的希望。余又曰：總裁究竟要我辦金融，抑仍欲余任政治？若不欲我任政治，則不必多此一舉。總裁乃說：「你做一部份政治做得好，在中共做不好」。余說：「現在中共誰做得好」？⁸⁹

面對黨內勢力的互相指控，蔣介石習慣用道德威權止息爭吵，並且小心翼翼的繼續維持各個派系對於自己的忠誠。這種依違於現實的思考路向，不能提供改革的充分動力，倒是為蔣的最高仲裁者地位不斷增添負面的形象。對於政學系、孔宋等人恃蔣而安居其位，國民黨右翼分子始終不以為然；同樣的，對於黨內右翼分子一再能以黨國尊嚴為口實，抗擊戰後和平呼聲，親政學系等主事者也不禁要懷疑：「總裁對政協會之法議，在兩可之間，因受此等之危言聳聽，遂亦走上討厭政協會這一機構，及其所產生之果實。」⁹⁰包括黨內右翼以及革新陣營在內，沒有一個國民黨派系認為自己的政見獲得總裁的充分支持與伸張，當然也就沒有人確知國民黨真正的政策走向為何。黨內充斥著低盪的灰色情緒，革新陣營則是寄望藉由再一次公共論壇的場合，重振成員的熱情。就在內政外交紛亂的背景下，1947 年召開的國民黨第六屆中

88 馬歇爾視阻礙國共和談的國民黨右翼為「反動派」，並曾建請蔣介石更換某些阻礙改革的內武官員。根據顧維鈞的說法，這些人至少包括陳立夫、杜聿明等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分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60、308。參見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冊 8，1946 年 5 月 4 日條，頁 270。

89 〈陳果夫先生民國二十五年至四十年日記摭錄〉，1946 年 3 月 28 日條，頁 936；參見李濟生、張敏，《民國兩兄弟》，頁 380-382。陳果夫最終仍留在原位，黃紹竑留下的浙江省政府主席職位則由沈鴻烈接充。

90 雷震日記，1947 年 1 月 22 日條，見胡虛一註言，〈雷震日記介紹及選註〉，李敖等著，《外交·性交·交》（臺北：李敖出版社，1987 年 8 月），頁 193。

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以下簡稱六屆三中全會），替革新陣營再度營造了一個宣揚清議的機會。

（三）六屆三中全會

這一年的3月1日，行政院長宋子文在他的財政政策導致1月和2月初的黃金風潮之後黯然下台，自嘲以：兩年中落得國人皆恨。⁹¹革新陣營隨即就閣揆人事布局發動輿論攻勢，例如親 CC 的北平《世界日報》即以〈請蔣主席慎選行政院長〉為題發表社論，一方面反對所謂「蔣主席掛名，副院長負責」的權宜之計，一方面則直指目前是國民黨「起死回生的唯一革新機會」，不能讓政學系分子擔任行政院長。兩路論點，矛頭實則一併指向出線呼聲甚高的政學系領袖張群。社論並以辛辣露骨的筆調提出警告：「如果政學系乘時而起，則我們敢預言斷言，政學系不特不能對眼前大局有所補救，其糜爛污穢的程度，且甚或過於孔宋。……政學系自頂至踵，充溢著官僚政客之腐敗奸詐。他們伺候過北洋軍閥，才伺候過陳炯明，豈僅不革命，而且貨真價實，一貫地道的反革命。」⁹²

政學系成員對國民黨的忠誠度幾何？黨內右翼分子對此一向存疑，《世界日報》的社論如實的反映了這種心態。⁹³ 3月15日起，在南京舉行的六屆三中全會當中，以孔祥熙、宋子文為標靶的所謂政治豪門、官僚資本主義，

91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冊8，1947年3月1日條，頁380。

92 〈請蔣主席慎選行政院長〉，《世界日報》（北平），1947年3月3日。社論反對蔣介石掛名院長、另以副院長實際負責政務的理是：「此出任副院長之人，可能為一種有計劃之陰謀，即處心積慮，欲篡取今日政權……擬以蔣主席為擋箭牌，利則歸己，禍則移人。」事實上，蔣介石早在2月即已考慮自兼行政院長，並以張群為副院長。《世界日報》社論反對蔣掛名院長，實際上仍是針對張群而發。參見雷震日記，1947年2月21日條，胡虛一註言，〈雷震日記介紹及選註〉，李敖等著，《抗議·抗議·站》，（臺北：李敖出版社，1987年12月），頁213-214。

93 雷震一向頗為親近政學系分子王世杰。在雷的日記中，曾經於宋子文下台之前記道：「與立夫談了二小時。余之意見，以為國民黨今日之局面，乃黨內不團結所致，希望彼與張群、孫哲生、王雲艇、陳誠、朱家驊六個人，要深深覺悟，加緊團結，則局勢〔勢〕尚有可為，不然任何人上台，均不能發生作用。渠除訴苦外，認為他們不應向外國人面前說他壞話，並云確有證據。所指何人，因未明言，似為王雲艇先生。渠對王相當不滿意，認為王常云『你們黨如何如何』，似王本人非本黨耶！並囑余應為解說。」雷震日記，1947年2月18日條，〈雷震日記介紹及選註〉，李敖等著，《抗議·抗議·站》，頁210-211。

和以政學系分子為標靶的所謂官僚主義，繼續受到革新陣營的抨擊。即就政學系而言，西康自去年底起掀起大規模民變，人事立場親炙張群的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1895-1976）成為眾矢之的；政學系要員陳儀主政下的臺灣，甫於三中全會開幕之前爆發全島性動亂，史稱二二八事變；對蘇外交失敗及東北問題亦廣受注目，主事的王世杰與熊式輝等政學系分子領受黨內輿論壓力之鉅，實不亞於去年在重慶舉行的二中全会。⁹⁴

3月18日，革新陣營在三中全會會場嚴厲抨擊外交部長王世杰的對蘇綏靖政策，特別是雅爾達協定及外蒙獨立事，黨內右翼認為不啻屈膝無能，跡近國恥。會場發言幾乎都讓幾位革新陣營的成員壟斷了，王世杰只獲得前駐蘇聯大使邵力子（1882-1967）為其公開辯護。逐項答詢之後，王世杰向大會宣布決意辭去外長職務。當日辭呈送達蔣介石官邸，王世杰以「不獲本黨同志多人之信任」為由，請求解職。蔣介石則於當天寫道：「黨外同志之徒尚意氣，而不顧大體，顧如是耶？是又增余之憂慮矣。」⁹⁵

蔣介石對於黨員「徒尚意氣」的憂慮，可能既是目睹王世杰的率爾請辭而發，也是針對黨內右翼分子徒逞口舌的悲歎。和二中全會如出一轍，黨內右翼針對政府各部門的執事者發動全面的清議式圍剿，蔣介石則仍然採用道德勸說的方式，一再提醒同志間親愛精誠的重要性。蔣介石同時告訴他的同志們，外蒙案全係他的主張，相信應可藉此換回北滿。⁹⁶在蔣介石對三中全會發表兩次語調沉痛的講話之後，革新陣營似乎感到事態嚴重，包括梁寒操、潘公展等二十六名中央委員於是聯名函蔣，剖白心跡，表達忠誠。不過，函中仍然不忘繼續撻伐那些飽受全會指摘的所謂「少數不良分子」：

94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243-244。參見《申報》（上海），1947年3月19、21-23日。

95 參見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冊8，1947年3月18日條，頁389；《申報》，1947年3月19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事略稿本，1947年3月18日條。

96 蔣中正，〈發揚黨德完成革命〉，1947年3月17日在六屆三中全會總理紀念週講詞，與〈最近一年來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之報告〉1947年3月21日在六屆三中全會講詞，見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頁41-53；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冊8，1947年3月21日條，頁391；李新總編、汪朝光著，《中華民國史》，編3卷5，頁300。

本黨至於今日，垂危極矣。黨員等隸名黨籍，追隨 鈞座，均已年有餘，無不激於愛主義、愛 領袖、愛黨之赤忱，乃作坦白之檢討。此與 鈞座往日倡導黨中自我批評之精神，與負責任、守紀律之明訓，似不相悖。討論外交時，絕無有一言一語反對國策之主張，而僅致慨於中蘇友好之依然未能圓滿，乃王世杰部長答復時，竟自動昌言辭職，若有負義之辭，此固吾人等所深惑不解者。台灣民變，中外注目，以五十年淪陷亦歸之人民，而於勝利一年有半之今日，演變至此，固任何人所痛心，黨員等為吾中共收拾民心，以籌善後之計，乃有撤辦負責長官之法議，其動機之公誠純潔，無愧神明。且今日地方政治之敗壞，何止台灣一省。疆吏之無改於昔日之軍閥作態者，不一而足，怨聲載道，壅於上聞。黨員來自各地，目擊心驚，蓋幾有不忍再言者矣。至若金鈔風潮，日於運冊失宜，配售黃金，顯有情弊，監院早經彈劾，已為國人所週知，無論虛實，要宜澈查。黨員提議中共應依法懲治，自問固無逾越範圍之處，惟其愛黨愛 領袖之真切，不忍見本黨與 領袖之聲譽，為一二黨員違反主義行為之所毀，始有不避嫌疑，率直檢討之舉。昨日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之人士，詳執此少數黨員之措施以攻擊本黨，本黨又將何辭以解？其結果只令革命先烈五十餘年締造艱難之黨譽，為少數不良份子所毀損淨盡而已。⁹⁷

革新分子視自己的清議言論「公誠純潔，無愧神明」，蔣介石則是始終以為不過出於意氣之爭，「唯有置之」。⁹⁸事實上，蔣介石仍是革新陣營口中「少數不良分子」的最終權力來源，革新成員在黨內鼓弄言詞干戈的舉動，不免成為蔣的莫大困擾。三中全會會期的最後一日，正逢週一，蔣介石在上午的總理紀念週當中發表講話。根據羅家倫（1897-1969）的記述，蔣的話語「仍然是痛苦的情緒」。蔣介石指出王世杰是最負責任的部長，尤其對外蒙事；並且

97 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事略稿本，1947年3月22日條。聯名者包括梁寒操、潘公展、張道藩、賴璉、谷正鼎、谷正繼、甘培成、白雲梯、王德溥、劉立島、余井塘、胡健中、洪陸東、蕭銓、劉健群、李中襄、樓排孫、傅啟學、日崑山、齊世英、傅汝森、程中行、李嗣聰、魯蕩平、姚大濤、黃宇人。

98 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事略稿本，1947年3月22日條。

擔保宋子文在行政院長任內絕無貪污；至於陳儀或許用人不慎，有意做壞則未必。語間，蔣介石又挑明指出革新陣營裡的重要言論家任卓宣專門說些不負責任的話——這幾乎讓人聯想到素享「大砲」聲名的黃宇人，在一年前的總理紀念週上，同樣遭到蔣介石橫眉怒斥的二中全會往事。⁹⁹

羅家倫在主席台幕後聽到蔣介石這番近乎情緒性的講話。羅置身後台的原因，是和孫科、戴季陶（1891-1949）、陳布雷等人一同修改三中全會即將討論發表的大會宣言。這份宣言承襲了二中全會宣言的若干內容與精神，包括重申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理想，以及實施憲政的決心。至於如何刷新國民黨，以便回應黨內外的黨務改革呼聲，宣言並無隻字片語提及。¹⁰⁰台前，蔣介石的沉痛講話仍在持續。未了，蔣介石甚至對著三中全會場內的出席、列席代表表示，大家既然不信任他，他不能再負責了。¹⁰¹

三中全會折射了革新運動大部分的結構性陰影：運動的參與者言之激切，卻始終短缺層峰的鼎力支持或同情；革新陣營內部有欠穩定的派系結合基礎，則是再度斷喪了黨內右翼獲致緊密合作的任何機會。全會閉幕日下午，大會選舉常務委員。自由票選中常委一事，原是革新運動去年在重慶獲得的重大成就，當時多位革新陣營少壯分子，藉由自由選舉的程序與派系換票的手法，得以大舉進入中央常會。然而，基於每次中央全會應改選三分之一中常委以便汰舊晉新的規定，三中全會需要就十二席依規定騰出的中常委位子進行改選。詎料 CC 系打算將自己在中央常會裡的政治地盤擴展至最大程度，意欲包辦，革新陣營裡的黃復青勢力與中立分子遂生反彈。¹⁰²

最後的改選結果可能不是 CC 系樂見的：拜革新陣營內訌之賜，五十九

99 二中全會閉幕當天，革新陣營成員黃宇人在會上指撻大會宣言欠缺革命性，主筆起草的陳布雷悲憤至於痛哭，蔣介石遷怒於黃。翌日，蔣介石在總理紀念週上，以極其嚴厲、冗長的批評怒斥黃宇人與革新陣營，指黃雖主張革新，實亦官僚，革新陣營的目的只在攫取中常委職位。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 243。

100 蕭繼宗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中國國民黨宣言集》（臺北：編者印行，1976 年），頁 388-393、404-411。

101 詳見羅大芳註記、邵銘煌校讀，〈羅家倫先生日記——民國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近代中國》，期 131（1999 年 6 月），1947 年 3 月 24 日條，頁 152-153；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冊 8，1947 年 3 月 24 日條，頁 393。

102 羅大芳註記、邵銘煌校讀，〈羅家倫先生日記——民國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近代中國》，1947 年 3 月 24 日條，頁 153。

歲的政學系首腦張群，生平首次進入國民黨的中常委之列；黃復青勢力的著名組織工作者康澤（他在三青團中央組織處長任內，將該團扶植到足以與國民黨抗衡的地位），同樣首次成為黨的中常委。最令 CC 系等革新分子沮喪的，也許要算是全會閉幕後，國民政府改組行動下的行政院長人事。全會前，張群接任閣揆的風聲甚囂塵上，CC 等右翼勢力力阻之。全會期間，革新陣營要求全會決定政府改組的原則與細節，以免此一問題由少數高級領導人左右，然而革新陣營的提議無疾而終。¹⁰³全會閉幕後，蔣介石暫兼閣揆月餘的局面宣告結束，毫不令人意外的，張群果然出線，啣命擔任新任行政院長。

（四）革新運動的收束

一般認為，1947 年春天的國府改組之舉是國民黨是否有誠意迎接憲政的關鍵性指標，美國方面期待尤殷，視為援華前提。4 月，新任國府委員和行政院人事納入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人士以及社會賢達，期能擴大政府的黨派基礎。基本上，CC 系被刻意排除在新政府的人事名單外，此與美方事前關切有關；至於美方所稱政學系當中最傑出最能幹的人物（如張群、翁文灝、王寵惠〔1881-1958〕、王世杰等人）獲得的職務任命，則是讓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 1876-1962）大呼「令人興奮」。¹⁰⁴儘管如此，改組後的國民政府能否具體實現社會與經濟的改革，還有待存問。決定這個問題的因素很多，司徒雷登特別關注的，是蔣介石的態度及其控制國民黨的能力。這就意味著，美方認為國民黨仍然是當前中國政治的主導力量。事實上，即便國府改組一事顯示了國民黨在政府人事問題上的妥協性格，不過國民黨從未放棄政治支配者的角色。舉例而言，國民黨在擴大政府的黨派

103 參見《立報》，1947 年 3 月 22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立物圖書〉事略稿本，1947 年 3 月 22 日條。

104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Apr. 19, 1947, in 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90-91.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聲明美國援助將給予改組後的民主政府。2 月，司徒雷登即已表示，如改組後的國府委員會有陳果夫或陳立夫，則不能取得美國信任。雷震日記，1947 年 2 月 20 日條，〈雷震日記介紹及選註〉，李敖等編著，《抗議·抗議·站》，頁 213。關於 1947 年的國府改組，參見李新總編，汪朝光著，《中華民國史》，編 3 卷 5，頁 684-692。

基礎之後，同時又成立黨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即足以體現這個黨在國家政治當中仍難扭轉的支配性欲望。¹⁰⁵根據中央政治委員會組織的設計原意，這將是一個連結國民黨機器與從政黨員的橋梁，是國民黨「對於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¹⁰⁶然而耐人尋味的是，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獲兼這個委員會的秘書長。

鑒於 CC 系繼續在國民黨機器裡占據可觀地位，美國方面對於新政府的施政措施能否不受黨方阻撓，仍有疑問。司徒雷登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指出，撇開國共內戰的因素不談，由於中國內部問題的複雜性，此時如果要求國民黨中國迅速改變是不合現實的。司徒認為，國府改組後的成員質量，可能為國家的變革帶來稍許的進展，但是最難估計的，仍是蔣介石能否聽從「開明派」官員的建言，以及能否對那些立場「反動」，但卻保證效忠的幕僚報以毫不退讓的態度。¹⁰⁷

事實上，無論「開明」或是「反動」的標籤，在國民黨的派系政治當中，從來就是一種流動的概念。各派系習慣將政治敗壞的責任丟給敵對派系，互控「反動」，蔣介石則多半不採取實質仲裁。這是因為不同派系在不同部門的作為，例皆反映了蔣的部分政治利益與態度。職是之故，面對黨內失控的派系政治，蔣只能繼續將各派系的整體實力謹慎維持在一定的比例與部門之中，俾建立自己想像中的統治秩序，如同他安排張群及一批政學系分子進入新組成的國民政府，另外則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委諸陳立夫掌理會務；又如三中全會閉幕後，那些在政府部門受蔣倚重，卻遭革新分子力抨的代理人，仍然以各自的方式安享其政治生命。¹⁰⁸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只要

105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Apr. 19, 1947, in 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p. 92.

106 第 26 次會議，1946 年 4 月 1-2 日，中共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 193。3 月，蔣介石於二中全會指示撤銷國防最高委員會，恢復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案經大會決議通過。

107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Apr. 19, 1947, in 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p. 92. 參見張嘉璈日記，1947 年 5 月 9 日條，《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下冊，頁 831。

108 王世杰的外交部長職務延續至 1948 年底，蔣盤算下野之前；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繼續守著他的「地方王國」，直到 1949 年底投共；三中全會閉幕五個月後，蔣介石才將東

敵對派系安居其位，繼續扮演蔣介石的部分政治利益與態度的代理人角色，派系互控的行爲就仍然不會消失。其結果：蔣介石無法圓滿討好到任何一個派系；對蔣「偏信」、「偏聽」的認知疑雲，則在每一個意欲伸張「正義」的派系心中始終揮之不去。

革新運動以「團結」的口號開始，相當戲劇性的，亦以「團結」的口號結束。8月9日，革新陣營的中堅幹部決定正式結束這場歷時一年半的運動，此舉並非成員們終於領悟到革新陣營裡的內部團結似乎永遠是個奢望，相反的，依照十三位首都座談會召集人的說法，運動的「及時結束」，是因為蔣介石月前指示國民黨與三青團應即辦理合併（即黨團統一），革新陣營自認「為加強團結」，應「使過去局部同志所發動之革新運動推展於全黨」之故。在9日座談會上，革新陣營以〈敬告本黨同志〉為題，發表千字宣言。文中回顧革新運動的發起動機，數度申明唯有「團結」與「革新」才能挽救國民黨。宣言也對黨團統一的決策表達竭誠擁護，並呼籲黨員透過黨團統一運動的團結指令，實現革新陣營一向主張的革新、改造精神。¹⁰⁹

這份宣言似乎暗示，革新運動的收束係出自陣營中人的主動作為。由於欠缺進一步的資料，目前尚不清楚蔣介石在運動收束的決定上，扮演何種角色。但是革新運動召集人之一的賴璉，則在晚年透露若干訊息：「我們自重慶還都一年多，有人說那運動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才有人承認這裡面是充滿若干黨員的熱血的。我們才竭聲嘶的空嚷一陣，還是進步毫無，一籌莫展。最後總裁還在廬山召集我們談話，嚴厲的訓斥了我們一頓。我們山窮水盡，只有宣告把那運動立刻解散，把那空口說白話的工作完全停止。」¹¹⁰蔣介石的訓斥內容為何？是否直接飭令解散革新運動？這些細節猶待一手資料說明。

北行轅主任一職委令參謀總長陳誠兼充，至於熊式輝的卸職，與革新陣營幾個月前的攻訐並無直接關係；全會閉幕半年後，宋子文東山再起，擔任國民革命發源地廣東的省主席；儘管陳儀於二二八事變後離臺賦閒，但蔣介石對陳儀仍畀與信任，並在1948年安排陳返中兩人共居的家鄉浙江，接任省主席一職。

109 〈首都黨員黨政革新運動座談會致中常會函呈〉，與中國國民黨黨員黨政革新運動座談會，〈敬告本黨同志〉，1947年8月，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案》，6.3/112.7；《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8月12日。具名的十三位召集人是梁寒操、張道藩、谷正繼、賀衷寒、蕭鈺、賴璉、余井塘、劉健群、蕭贊育、任卓宣、羅貢華、鄧飛黃、陳介生。

110 賴景瑚，〈辨黨、辨報、辨學〉，《煙雲思往錄》，頁156。

無論如何，隨著蔣介石公開表態，打算經由黨團統一，實現國民黨的改造，而革新陣營的主幹正是黨方與團方的人馬，因此，革新運動的繼續存在，就算不是不合時宜，毋寧也有贅冗之嫌。這樣，在8月下旬，亦即以黨團統一運動作為核心議題的幾場黨、團高級大會即將開幕之前，革新陣營終於將他們的結束宣言正式呈送給國民黨中央常會，請求備案。到此，革新運動畫下句點。¹¹¹

五、結論

抗戰勝利初期的革新運動係由國民黨右翼幹部所發起，實則國民黨人懼於統治失墜的集體內在焦慮，以及黨國體制經受戰後新局的外部刺激之下，聯合釀成的政治產物。革新分子試圖削減蔣介石的黨內權力，期能保證像中央常會這類的黨內正規機制得以確實主導戰後黨政人事與政策走向。他們歷數國民黨執政十餘年來的腐化無能，要求放棄戰後初期對共黨問題一度採行的綏靖政策，並且期待以革新黨務、政治的姿態，喚醒國民黨的執政活力，挽回所謂的黨國尊嚴。總體而言，革新運動的特殊意義並不在於嚴厲批評國民黨事務的部分，畢竟這些言論既非空前之舉，也未曾絕後。重要的是，這場運動是由「誰」操作的。只有從行為主體的角度出發，我們才能較好的理解這些政治清議的真正價值。事實上，自從1930年代以後，這甚至是國民黨內擁蔣陣營裡的右翼成員，第一次將他們對於中央的政治不滿，正式曝陳在中國公眾的眼前，也是黨內擁蔣右翼首次公開質疑總裁領導作風的抗議行動——儘管他們始終小心翼翼的避免留給蔣介石與人們這種批評領導人的印象。

當然，革新運動從來就不是一場「反蔣」的運動，但是就在運動發起的十年前，這些黨內右翼分子還是捍衛蔣介石不遺餘力的主要角色，然而現在，他們不少的言論倒是和訓政初期反蔣者的批評有著驚人的相似處。表面

111 〈首都黨員黨政革新運動座談會致中常會函呈〉；第82次會議，1947年9月3日，中共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486。從9月5日起的三周內，南京為了黨團統一問題，共舉行了三青團二屆二中全會、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及中共黨團聯席會議。

上，蔣介石贊成革新分子的若干革新態度，但他也曾經公開譴責這些成員的權謀動機，以及針對革新運動可能帶來的政治混亂表示憂慮。依照蔣介石的秩序觀，黨能否遂行有效統治，端視黨人能否一心服從其個人領導，然而革新運動的激進政見顯然牴觸了蔣的紀律化思慮。

1980年代以降，對於國民黨內部狀態感到興趣的研究者，才逐漸正視革新運動的問題。大體上，他們關心的是研究客體裡層揮之不去的宗派主義及其負面影響，旨在說明國民黨最終退出中國大陸的內部傾軋因素。作為這套內幕研究系譜的鼻祖，易勞逸在 *Seeds of Destruction* 當中這樣評論革新運動：「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苦於部分裂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成員除了滿足個人及派系的快慰之外，根本沒有共同的奮鬥目標。」¹¹²革新運動到底是一場貨真價實的改革運動，還是夾雜了各式各樣私人動機的政治操作呢？任何醉心於派系內幕，特別是鑽研國民黨派系內爭的學術工作者都可能得到類似易勞逸上述的論點，亦即傾向後項的解答。但是筆者的態度則是，改革運動與政治操作之間，可能不必然存在著涇渭分明的界線，相反的，它們毋寧更比較像是「至公」與「至私」心態的持續互訓，主觀理想與現實利益交相揉雜的複雜過程。

研究晚清清議現象的西方學者石約翰（John E. Schrecker, 1937-）和瑪麗·蘭欽（Mary B. Rankin, 1934-）都指出，一般認為清末清議派都是無可救藥的死硬分子、懼外排外、阻礙改革，這種看法不見得正確。例如1880年代，有一批清議派在仿習西方的態度上開始不再那麼僵硬；到了1898年，許多改革派領導人，包括康有為（1858-1927）在內，其實都具有深厚的清議淵源。循著上述觀點，石約翰甚至認為1870年代開始的清議運動，和1890年代的維新運動之間，存在重要的內在聯繫關係，亦即都是政府和上層社會內部的，一脈相承的反對派運動。¹¹³極為相似的，將「保守」、「反動」等字眼冠諸1940

112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7.

113 John E. Schrecker,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the Ch'ing-i: Reform as Opposition," in Paul A. Cohen and John E. Schrecker, eds.,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89-305; Mary B. Rankin,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ower: 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1, No. 3 (May 1982), pp. 453-454, 467-468.

年代的國民黨右翼分子，恐怕也不盡能涵攝其總體性格。事實上，如同十九世紀後期某些清流分子最終轉向並從事激進改革的例子，國民黨內右翼在1940年代透過革新運動所展示的政治不滿，同樣不只投射在那些被認為要承擔政權傾頹責任的官員身上，而且也反映在他們所提出的激進改革計畫，或是可能導致更張政治的任何私密念頭。

就革新陣營提出的黨務積弊而言，時人共認，極具公信，這也是他們能夠爭取到一些跨派系盟友支持的原因，換言之，革新運動的主張確實體現統治階層某種程度的集體內在焦慮。不過，革新陣營「寄希望於層峰」，正是革新運動淪為殘缺政治運動的一個癥結。事實上，革新陣營很少深究這場運動的矛盾性格：一面想要分削總裁權力，一面卻又寄望獲得蔣介石毫無保留的加持而實現目標。此外，如同易勞逸的前述論斷，革新分子對待宗派主義的真實態度，多少使得這場運動在公與私的天平上有所傾斜。例如在「人謀不臧」這條攻擊火線上，派系成見的成分與意識形態的畛域顯而易見。同時，革新陣營裡的不同派系始終沒有和衷共濟的共識，CC 與黃復青勢力依然各自徵逐自己的利益，曾經高懸的「團結革命同志」口號因而形同華美不實的空中樓閣。例如1947年行憲選舉就提供國民黨與三青團一個絕佳的機會，以便把他們的成員送到像國民大會、立法院這樣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位置上，但是競選的前哨戰卻再次催化了黨與團（主要即是CC 與黃復青勢力）從中央到地方的惡質競爭，稍前三中全會激起的清議已經無人顧及。¹¹⁴總的看來，革新陣營以燈塔、火炬等光明之源自命，他們確實折射出一些陰翳的區塊，除了他們的黨，也包括自己。

114 關於1947年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等行憲選舉，以及國民黨與三青團在各地的選舉紛爭，詳見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頁338-343、361、365-370。

**A Shadow under Reflection:
The Guomintang's Ge-xin (Innovation) Movement,
1946-1947**

Liang-ching Wang*

Abstract

The Ge-xin (Innovation) Movement of 1946-1947 was a political movement initiated by some of the Guomintang's right-wing members, and was also the first Guomintang reformist movement during the postwar era. The occurrence of this movement was a reflection of the Guomintang's incapacities. Observing this movement gives us a chance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Guomintang's members recognized and solved the crises faced by the party, as well as the personality defects of some members revealed through the damage control process.

Keywords: Ge-xin (Innovation) Movement, Guomintang (Kuomintang), Jiang Jieshi (Chiang Kai-shek), factionalism, CC cliqu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兩岸發展史研究

第四期

臺灣史專號

編輯者	兩岸發展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李羅權
出版者	中大出版中心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電話：886-3-4227151 轉 33750
	傳真：886-3-4255123
	電子郵件：ncu3750@ncu.edu.tw
	網址： http://www.ncu.edu.tw/~hi/
封面設計	廖容聖
承印廠商	印通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886-2-8630-3966
出版日期	2007 年 12 月
ISSN	1990-7540
GPN	2009501713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Journal of Cross-Strait Studies

NO. 4

**A Shadow under Reflection: The Guomindang's Ge-xin
(Innovation) Movement, 1946-1947**

Liang-ching W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CU Press
December 2007**

**ISSN 1990-7540
GPN 2009501713**